



2026年9月刊

布尔什维克月报

Ежемесячный Большевик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布尔什维克》月报

Ежемесячный Большевик

2026年09刊

我们是谁：

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处于危机的时代，亦是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时代。能够更换天地的工人阶级力量，唯有匹配上最能引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党，才能终结资本主义对人类文明的摧残，带来社会主义的新生！

要建立先锋队，首先要抓紧理论斗争。《布尔什维克》旨在传播分享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致力于使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中国阶级斗争的理论参考点，成为激进层、工人阶级乃至劳苦大众眼中解放社会的可见纲领和指针！

革命理论的传播需要更多的助力，如你也是同志，请联系我们、订阅《布尔什维克》月报、将我们的文章和频道转发给更多的左翼群体！或者向我们投稿！

官方网站：<https://bolshevik.red/>

联系与投稿邮箱：bolsheviks.red@proton.me

月报订阅邮箱：bolsheviks.sub@proton.me（订阅方法：向该邮箱发送任意内容邮件，亦可通过本刊电报和推特频道下载）

电报频道：https://t.me/bolshevik_red

推特频道：https://x.com/bolshevik_red?s=11

书籍推荐：《中国：从不断革命到反革命》

往期杂志：[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第六期](#)

目录

01. 社论：不要哭，不要笑，要理解.....	11
02. 星宇股份事件：一场针对“逼辞”风气的群众性愤怒	15
03. 官僚为何重建资本主义.....	23
04. 伊朗战争与香港.....	25
05. 回顾黎智英和苹果日报高层判案.....	31
06. 中国青年的极简生活流行小史	37
经典	
07. 托洛茨基：斯大林因何能够打败左翼反对派？	45
转载	
08. 无产阶级文化论批判：从波格丹诺夫到斯大林主义	55
专栏	
09. 女性解放专题：LGBT：解放与革命	79
10. 共产主义问答：托洛茨基为何不政变推翻斯大林？	99

社论：不要哭，不要笑，要理解

布尔什维克编辑部

当今资本主义秩序正在面临的史无前例规模的危机正在影响着每一个社会和其中的每一个人。在宏观的社会层面，全世界的统治阶级都在发动系统性的对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和民主权利的攻击，而在反动力量的鞭笞之下，无产阶级也会逐渐开始组织其自发的反抗，并最终¹以阶级斗争的形式表达出来。

在中国，反动力量以一种颇为复杂且异质性的方式得以体现。除去最为强大的中共波拿巴，以及蝇营狗苟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派，资产阶级自由派也一度作为一股可观力量在香港存在一定的活跃空间。这三股力量竞相将自己标榜为人民利益的代言人，但实际上却都在不遗余力地欺骗和攻击中国无产阶级，且当下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是水火不容。那么，当反动的中共波拿巴镇压着秉持着敌对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者时，共产主义者会怎么看呢？单纯的“专制vs民主”或“本土vs亲西方”的二元对立分析还奏效吗？今年香港的[黎智英和苹果日报高层判案](#)应该是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一复杂局势的最新案例之一。

另外，最近的香港还有另一现象值得关注：它开始愈发被中东资本青睐。这是因为在中国以外，被伊朗战争加速的混乱格局也促使着资本的流向发生调整。中东资本为了避险开始在全球多元化投资，这反而造就了[当前香港的一时风光](#)。但资本主义的

一时风光不代表其内部的阶级矛盾被消解了。群众的意识在危机之下正悄悄发生着变化。

近日[星宇股份事件](#)中工人透过告洋状进行斗争所体现出的对中共的愈发不信任，以及中国无产阶级青年在近十年在消费行为上[向着“极简主义”的转变](#)，都以生动又具体的方式体现出中国工人阶级意识发展那微妙的分子过程，值得被捕捉到。虽然目前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尚处于早期阶段，不如欧美这般直观，但这绝对不意味着中国工人的阶级意识并未发展。表面的相对平静之下，群众意识也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分子性的变化——工人的意识会在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每日交互中持续发生微小转变，这正是质变前的量变过程。

除此之外，美帝近期对古巴革命的绞杀也令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悲愤交加。这一事件提醒我们：关于工人国家的问题——以及其背后更加基本的历史分析和其他理论——并非只属于遥远的过去或是历史爱好者的谈资，也是和今天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最具体的任务息息相关的。我们也许无法再去直接亲身观察中国资本主义重建的过程，所以[在古巴发生的进程](#)则更应该被马克思主义革命家视为严肃理解工人国家官僚性质和资本主义重建的机会。

而若是谈及堕落或畸形工人国家的官僚，可能被提出的一个历史问题就是托洛茨基是否有机颠覆斯大林政权。本期月报特意以托洛茨基的原文和编辑部撰写的简答，来对这一常见问题进行回答。

本期月报同时也包含了多篇关于工人国家方方面面的理论文章，例如对于[“无产阶级文化论”](#)深度分析，又如我们女性解放专题的收尾文章《LGBT：解放与革命》，这些相关话题想必可以帮助感兴趣的同志们加深对它们的见解。

在世界格局风云变幻的时代，马克思主义革命者首先需要做的，便是理解时代变化具体现象与其后的根本原理。历史上无数的革命组织之所以失败，并非因为其缺乏人力物力，或是没有遇上合适的历史机遇，反而是因为一次次地对形势的误判，导致无数的机会从他们眼前划过。真相毕竟总是具体的——只有不光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同时还能够灵活将其运用在当今的具体

条件和问题之上，才能帮助革命者通过正确、客观地分析，把握住事物的重点，从而制定正确的策略。

最后，让我们用伟大理性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话来为本期月报——以及本报过去一个月的政治重心——做一个总结：“不要哭，不要笑，要理解！”

星宇股份事件：一场针对“逼辞”风气的群众性愤怒

拓 守

近日，星宇股份因为一场“羞辱式”批量辞退应届生的丑闻引发广泛关注和愤怒。群众的愤怒不仅在于企业在“逼辞”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嚣张跋扈，以及一种“不怕你告”的有恃无恐的丑恶姿态，**更在于这种经历并非孤立存在：**中国劳动者普遍都经历过企业为避免违法追责和支付违法成本逼迫员工签下“个人原因离职”的经历。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事件中被逼辞应届生不再向国内的劳动监察部门和工会进行举报，而是调查公司的经营状况及其重要客户，向港交所、欧洲重要车企客户和欧盟劳动监管部门举报违反劳工标准等问题，瞄准企业港股上市计划和海外重要客户订单的“七寸”发力。虽然我们不能天真地期待同样以逐利为导向的欧洲车企和同样镇压劳工权益的“欧洲帝国主义联盟”会真心实意声援中国劳工权益的保护，但是在此次事件

中劳动者以行动表达的对中国劳动仲裁的不信任，是阶级意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

事件起因

星宇股份作为中国A股上市的车灯制造供应龙头企业，于今年7月招入400余名硕博应届生——Offer上明确写着研发、技术和管理培训生等岗位。但入职仅约38天，自8月8日起，公司开始分批约谈员工：要么签署“个人原因离职”滚蛋，只补偿半个月工资；要么被调去一线“打螺丝”并按普工标准重新签合同。在“HR群互通背调”的隐晦威胁下，不配合离职的学生可能受到地域行业内的求职排挤。最终约七成、近300人被逼辞。剩余约107位选择抗压留下的应届生，则被安排进入产线实习，而且被指产线实习期限被无限延长。

同时，“应届生身份”早已不仅仅意味着毕业时间，而是关系到求职机会、校招资格和部分公共部门招聘门槛的重要就业资源。对于这些被迫离职的毕业生而言，一旦因入职缴纳社保而失去这一身份，他们所承受的损失便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份工作，更可能意味着失去了重新进入部分就业渠道的机会。应届生身份绑定各类求职机遇，本身就是国家为了缓解年轻人就业问题的笨拙措施。但讽刺的是，在资本主义下的中国，一边是加班到死的上班人，一边是以千万记的难求一岗的求职者。国家的大手无力解决这种问题——中国毕业生上岗率也仅有55%——且他们归根究底总是站在老板阵营的那边。

面对产线实习的压迫和应届生身份的损失，选择留下的应届生员工最终决定将公司“羞辱式”逼辞应届员工的行径曝光于网络。而在中国，企业通过各种手段迫使员工主动离职，以规避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经济成本，本就是一种屡见不鲜的惯用伎俩。因此，这起事件迅速超出了个别企业与个别员工之间的纠纷范畴：无数曾经遭受过类似“逼退”的劳动者从中看到了自己的经历，并由此产生强烈的共鸣与愤怒，最终引发了全国公共舆论对星宇股份逼辞行为的广泛声讨。

向“洋人资本家告状”的新路径和进一步爆料

在向网络爆料后，涉事应届生在这次维权行动中选择跳开本地劳工部门，表现了涉事应届生对本地劳动监察部门和所谓工会的不信任。他们选择在星宇股份在冲刺港股IPO的关键节点把举报信送到港交所、欧盟和欧洲重要车企客户，搬请“洋大人”出手整治违规企业。国内舆论和保护海外重要客户订单等因素确实给星宇造成了有效压力：造成舆情失控的后果会引来更高行政层级的下场和内部惩戒；失去的海外重要客户订单会进一步恶化自身所处生产过剩的市场竞争劣势。虽然官方于8月27日发布了“致歉信”并提出了补偿方案，仍旧平息不了公共舆论和涉事应届生员工对羞辱式逼辞行为的愤怒，引发群众“中方半天不见效果，西药一吃效果立现”的调侃——这句看似荒诞的玩笑，恰恰反映出劳动者对于国内劳工维权部门的失望与不信任。

这种策略并非孤例。就像[亚马逊工人](#)选择在“黑色星期五”这一消费高峰期发起罢工，[Uber和其他网约车平台的司机](#)选择在情人节等订单需求旺盛的节点联合行动一样，劳动者也会有策略地将自己的诉求与企业无法忽视的损失联系起来去向资方施压。

无独有偶，在8月31日据凤凰网科技讯爆料，星宇股份在塞尔维亚的海外工厂还存在“同一座工厂，两套时间表”：当地塞尔维亚员工通常按照当地劳动法规执行朝九晚五、到点下班；而中方工作人员日均工作时长约为10小时。也强化了公众对于企业“柿子挑软的捏”的印象：面对劳动权益保障执行较为严格的环境，对当地劳动者谨慎行事，却将更高强度的劳动要求施加在本国劳动者身上。

由此，“不把自己人当人”的批评也迅速成为围绕这一事件的重要舆论表达，中共向来鼓吹的民族叙事在对比之下更显讽刺：当中帝需要利用无产阶级的愤怒去对抗其他与之竞争或妨碍其帝国主义利益的别国时，无产阶级是自己人；但当中国资本家真金白银地赚钱剥削时，被称为“自己人”的中国无产阶级就是最不需要被珍惜的人矿耗材。说到底，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国家机器从不是无产阶级的自己人。就如《共产党宣言》所言，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是“互相直接对立。” 无产阶级本就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

“越洋告状”的探索意义

鉴于全国各地劳监部门打压劳工权益的前车之鉴比比皆是，涉事应届生员工也清楚波拿巴国家机器对于本地企业偏袒和保护。这一点也得到了一些[政府发文](#)的证明：部分地方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甚至出现限制劳动监察进入“重点保护企业”、以牺牲劳动者权益作为招商引资条件的现象。

正是对这种阶级经验的长期积累和总结，涉事应届生员工选择绕开本地劳动监察和工会体系，转而向海外组织和企业“告状”，这一“越洋告状”本身仍是一种尚处于摸索阶段的维权经验，却已经获得全网的喝彩和支持，至少反映出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劳动者已经不再相信波拿巴国家体系控制下的劳动监察和工会体系能够有效维护劳动者的权益，表现出劳动者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在现实劳资关系中往往更倾向于维护资本正常运转、保护企业经营利益这一现实的认识加深，同样“越洋告状”的107人也是一种劳动者团结的维权方式。集体行动的有效性使劳动者意识到了，比起单打独斗对抗老板，团结起来、寻求有效打击资产阶级的战术才是更有利的。

向“洋人资本家告状”真的有效吗？

与此同时，这种行动中也存在着另一种值得警惕的认知偏差：即欧盟的监管机构、政治力量或资本主义企业对“劳工权益保护”的幻觉。事实上，欧洲并不存在一个脱离资本主义利益的“劳动者天堂”。欧盟本身是欧洲二、三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联合体，其政策同样服务于欧洲资本家的利益——但欧洲各个民族国家的资产阶级利益又彼此有冲突。近年来，随着欧洲各国不断提高军费开支，财政资源与社会支出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例如德国，[德国军费](#)近年来迅速攀升：2026年国防相关总支出将达到约1082亿欧元，并计划在未来几年继续提高国防开支。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又[面临](#)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持续增长。军费扩张与养老金、医疗、失业救济等不断增长共同争夺有限的财政资源。

这种矛盾并不仅仅体现在财政预算上，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近年来欧洲因为资本主义危机和俄乌冲突的地缘政治影响，导致了生活成本上涨、通货膨胀冲击以及实际收入压力等等严重问题。欧洲各国在工资、福利和就业保障被削减等问题上的阶级斗争也从未停止，例如法国，[法国](#)逾50万人走上街头，以罢工反对政府财政紧缩方案——所谓“文明社会”并没有消除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根本矛盾。

另外，星宇股份所依赖的海外客户——奔驰、大众、宝马等欧洲汽车企业——本身同样不是站在劳动者利益一边的“救世主”。它们首先是以利润和市场竞争力为目标的资本主义企业。当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利润率受到挤压时，削减劳动力成本、关闭工厂和裁撤岗位，同样会成为这些欧洲企业的选择。

大众的案例尤其具有代表性。面对利润压力、市场竞争和产能过剩问题，大众计划关闭德国工厂和大规模削减岗位，通过削减劳动力成本、压缩产能等方式降低经营成本。这一行动在德国将减少超过3.5万个工作岗位，规模约相当于大众汽车股份公司德国员工总数的四分之一，尽管有优于中国国内数倍的优渥补偿标准，但是没有收入来源，钱迟早会花光。被辞退员工的再就业困难和长期失业的消耗，也为德国被裁员工埋下长期的不确定性和生存危机。

奔驰同样在进行大规模劳动力调整。[欧洲劳动关系观察机构Eurofound](#)记录显示，奔驰在德国推出了自愿离职计划，并预计可能造成约5500个岗位流失。

因此，即使是宝马、大众、奔驰这样的欧洲汽车工业巨头，也并不会因为自身位于欧洲的“文明社会”成为劳工利益的捍卫者。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具有国际性：当利润增长受到威胁时，无论企业位于中国还是欧洲，裁员降本增效、关闭工厂以及向劳动者转移经营风险，都是资本经常采取的手段。大众近年来围绕德国工厂关闭和数万个岗位削减的争议，正说明所谓欧洲资本家同样会直接攻击本国劳动者的就业利益。

正因如此，对于欧洲政客、监管机构以及跨国企业客户表现出的对中国劳动者权益的“关心”，我们同样有理由打上一个大

的问号。它们是否真正关心中国劳动者的处境？答案显然不能从它们的口头表态中寻找，而必须从它们自身在本国劳资冲突中的实际行为中加以判断，[法国](#)近年来围绕养老金改革爆发的大规模罢工和社会抗议，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提高退休年龄、要求劳动者延长工作年限，本质上就是试图通过攻击损害劳动者的退休权益来缓解国家财政压力，面对法国群众的抗议，作为欧盟重要成员国的法国资产阶级同样出动[军警镇压抗议](#)。显然一个镇压自己的工人阶级的政治实体，是不可能真正帮助其他区域的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益的，劳动者可以利用一切现实存在的矛盾，但不能把其他与工人阶级为敌的统治集团误认为“朋友”

阶级愤怒正为历史发展准备条件

星宇股份因一场针对应届生的“羞辱式”批量劝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和愤怒，在于这种经历并非孤立存在，广大劳动者对此类行为也是深恶痛绝。与以往类似事件不同的是，此次遭遇“逼辞”的应届生并未将维权的希望寄托于国内低效无能、甘当资本打手的劳动监察部门或“工会”，而是进一步实验尝试将企业的违反用工问题提交至海外客户和监管机构、以国内舆论和海外影响施压表达自身的权益主张和维护劳动权益。

当然，我们不能天真地期待同样以利润为根本导向的欧洲企业，或欧盟这一服务于欧洲资本主义秩序同样攻击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体系，会出于对中国劳动者的真诚关切而主动维护其权益。然而，无论此次行动最终能够取得怎样的结果，它本身仍然具有值得关注的意义：在一次具体的冲突中，劳动者积累的不仅是对企业压迫的愤怒，还有在现实斗争中形成的经验和阶级意识——他们认识到，仅仅依靠既有的、被认为难以发挥作用的维权渠道未必能够解决问题，尝试寻找其他的替代方案。

劳动者对国内恶劣用工环境以及企业将员工视为可以任意支配的“奴隶主”式思维的愤怒，并不会凭空消失，而革命意识并非脱离群众现实斗争而突然产生，阶级压迫所造成的每一次愤怒、失望与反抗，都可能成为劳动者积累阶级经验、认识共同处境，并逐步走向阶级意识觉醒的历史发展准备条件。

从根本上，就业和劳动压迫不会在资本主义下的中国得以消除。消灭失业问题，将失业人口纳入劳动并降低所有劳动者的工作时长，增加工资等等要求，唯有在工人控制的计划经济才可以完成。中国的工人阶级需要能推翻资本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理全世界也需要能一场推翻阶级社会的社会主义国际革命。而在欧洲和世界各地，我们真正的战友不是别国资产阶级，而是我们在那边的无产阶级兄弟姐妹。

官僚为何重建资本主义

艾蒂安

编辑部按：近期古巴革命岌岌可危，古巴官僚推动其走向资本主义重建。这一过程为何会发生？对照古巴今日进程，中国工人阶级亦可以更直观地对比和回顾过去中国资本主义重建过程，更深刻地理解国际革命和工人民主控制之于工人国家的必要性。因此，本编辑部特意转载三篇相关理论性文章，并请本文作者写就以下简介。

今天很多真诚的共产主义者将苏联解体、中国的改革开放称为资本主义的复辟，这在经验的层次上是可以理解的，显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取代了这些地方过去存在的工人国家计划经济。然而，这种表述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来源是旧有的资产阶级以及社会中所谓的资本主义意识，但不管在苏联、中国还是古巴，作为一个阶级的旧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重建时早已不复存在，资本主义的重建也不表现为旧资产者发起的反革命暴动。恰恰相反，新生的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重建的后果而非其原因。因此，资本主义重建的直接原因只能来自官僚阶层的推动。这一事实要求共产主义者从资本主义重建前堕落或畸形工人国家的内部矛盾本身出发，理解官僚阶层为何要重建资本主义，以及什么决定了工人阶级是否能成功反抗这种企图。

发生在我们眼前的古巴资本主义重建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被帝国主义严密封锁，又因缺乏工人民主工人控制而

历来被官僚们从上而下指挥着的古巴经济已经陷入无以为继的境地：，古巴的农业产出在过去五年间产出下降了超过一半，粮食和能源供给近乎崩溃。如此的困难将使得古巴的无产波拿巴政权面临被推翻的危险，而重建资本主义正是官僚阶层为了避免这一命运做出的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健康的工人国家来说，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克服它们首先需要古巴工人阶级对经济进行全面的民主管理和监督，而更根本的则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打破古巴面临的孤立。然而，这二者都会威胁官僚对于权力的垄断。彼时，在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发生的革命有望打破古巴面临的封锁时，古巴官僚因为错误的理论认识却为这些革命者送去了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议，一次又一次葬送拯救古巴革命的关键机会。事到如今，古巴经济已然在崩溃边缘，已无时间等待外部革命解决孤立情况。显然，和苏联和中国的前辈一样，今天古巴官僚毫无将政权送回古巴工人阶级手中的意愿，反而更加认定要重建资本主义。

厘清资本主义重建的概念并不是一个文字游戏，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将决定我们如何保卫既有的和将来的工人国家。现实证明新生资本主义不是从已被铲除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死灰中复燃的，它诞生于波拿巴官僚扭曲统治下工人国家本身的矛盾，也即国家计划经济和官僚统治的不可调和，一国范围内无法建成社会主义。唯有工人民主、工人控制的工人国家计划经济和国际革命，才是无产阶级胜利的唯一道路。因此，保卫工人国家的方法只能是堕落工人国家推翻官僚统治的政治革命，以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对其的支持。

文章推荐

1. [《捍卫古巴革命！打败美帝国主义！为世界社会主义而斗争！》](#)
2. [《面对难以承受的帝国主义压力，古巴正走向资本主义重建》](#)
3. [《中国：改革开放——资本主义重建还是复辟？》](#)

伊朗战争与香港

楠 & 思多葛

近来爆发的伊朗战争，给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带来了巨大冲击。战争伊始，石油、液化气、化肥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原材料价格便应声暴涨，几乎威胁到各个生产部门的正常运转。美帝国主义的鲁莽行径，导致世界格局、特别是亚洲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帝国主义借此在外交声誉上趋势崛起，俨然以国际关系”稳定势力”的姿态示人。

同时，香港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处理全球逾70%的离岸人民币支付业务。它还承担着中国帝国主义资本输出61%以上、资本输入56%以上的份额。此外，香港在2025年已成为中国大陆第二大贸易伙伴，截至2026年4月，按价值计算已是全球第五大商品贸易体，并坐拥2026年全球货运最繁忙的机场。

在这个情况下，伊朗战争的爆发，是如何影响着香港内各个阶级的呢？

流向香港的中东资本

香港在世界市场的重新瓜分中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随着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相对衰落，截至2025年末，香港已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佳财富避风港，跨国资产规模已达23万亿港元（近3

万亿美元），其中过半来自中国大陆及其他国家。香港财政司司长引用一份国际顾问公司的报告，称这一数字将[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直至2030年](#)。

在此情况下，香港政府持续代表中国资本积极推动与中东地区、特别是海湾国家建立贸易与投资联系。2023至2025年间，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先后出访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和卡塔尔，以建立商贸关系。[近年来](#)，海湾统治阶级的投资战略注重打造绿色和蓝色氢能中心以及推动工业脱碳，而中国在太阳能电池板生产与电动汽车制造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这就吸引了大量海湾资本前往香港和中国大陆投资。

2024至2025年间，约220亿美元资金从中东涌入香港，大致相当于2026年香港GDP的5%。根据[瑞银集团2025年的一份报告](#)，约18%的中东家族办公室表示有意投资中国，这些家族办公室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表现出浓厚兴趣，其中约27%已制定了具体的投资策略。近年来，[大量人工智能、新能源和电动汽车公司](#)从中国大陆涌入香港上市。香港靠近深圳、广州这些技术中心，且法律和商业环境与国际接轨，使其成为中东资本进入中国的首选目的地。

伊朗战争爆发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速。这是因为他们试图将自己的全球资产[重新进行配置](#)，虽然[北美](#)仍是他们的主要关注，但亚洲也提供稳妥的选项，其中热门选手就是香港。伊朗战争爆发的第一周，香港股市交投便骤然活跃，[升至半年高位](#)。香港交易所日均成交额升至3415亿港元，较战前水平增加了997亿港元。2026年第一季度，涌入香港的中东资金达18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7%。

正如列宁所说：战争是可怕的，有利可图得可怕。伊朗战争后，中帝羽翼之下的香港资本主义通过吸引海湾资本得到了强化。当精英阶层从战争中大发横财之时，香港的广大民众却几乎未能从这场“繁荣”中分得一杯羹，反而已开始切身感受到战争带来的伤害。

资本家的利润暴涨

战争伊始，伊朗便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了军事封锁。全球20%的石油供应，以及氦气、液化天然气等重要工业原料的

运输曾一度受阻。历经数月拉锯，战事仍未平息。截至7月下旬，全球原油价格仍维持在每桶83至90美元区间，明显高于战前约70美元的水平。

香港绝非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作为一座如此依赖全球贸易的城市，曾一度深受其害。陆路物流业与的士行业首当其冲，受燃油价格调整冲击最为惨重。2026年5月，国际能源冲击迫使香港特区政府[跨部门燃料供应监察专责小组](#)紧急实施[汽车石油气最高零售价上调1.06港元至每公升10.08港元，并向商用柴油车辆提供每公升3港元的补贴](#)。

然而，这些权宜之计仍不足以应对零售燃油使用的现实困境。因为造成香港油价高昂的并非单纯是战争造成的燃油紧缺，而是石油寡头的高额利润，而战争则给予了香港石油寡头一个借口进一步抬升其利润。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周文指出，香港油价贵绝全球，主要是燃油公司毛利（即零售价扣除燃油税和进口成本）突出地高。[1999年石油公司每升毛利只有约2.88元，如今已大幅升至21元至22元](#)——换句话说，油价涨的速度，远赶不上油公司涨利润的速度。

战争刚爆发时，国泰航空及其他航空公司一度面临航空燃油价格前所未有的飙升，曾短暂地影响了香港的空运。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统计，战争爆发后一个多月内，全球航空燃油均价已由每桶99.4美元飙升至209美元。航空燃油成本暴涨，重创了占香港出口38%、进口52%的空运贸易。国泰航空等承运商一度被迫通过高额燃油附加费将成本转嫁给货运客户，同时积极改道以避开中东空域，导致全球航空货运标准运力锐减多达20%。

不过，香港背靠中国的稳定地位，反而使得空运业在经历了最初的冲击后进一步繁荣。尽管燃油价格有所上涨，但由于中国暂停进口石油、稳定了油价，以及世界欧亚航班锐减导致客运需求暴增，以及AI相关货运订单暴增，在今年2026年第二、第三季度，香港空运贸易领先指数增长了[30%](#)。香港头号航司国泰航空的利润率反而逆势起飞，上半年大赚62亿港元的净利润、增加[71%](#)，廉航香港快运（HK Express）也开始[扭亏为盈](#)。

工人为战争后果买单

然而，战争即使使得香港经济如此繁荣，辛劳的工人阶级整体并不从中获利多少。一方面，他们的劳动果实的绝大部分都被老板夺走了，另一方面，战争的后果本身也开始逐渐显现。

首先，工资的增长与老板的利润的增长依然是完全不成正比的。国泰航空这样发大财的企业，也仅仅涨薪3.5%（甚至比去年少涨0.3%！）。对外，3月国泰航空宣称将发放远超一般水准的11周合格工资（Eligible Pay）奖金作为“酌情花红”（利润分红），貌似极其唬人。然而，根据网友在Thread上的实际分析，11周的奖金包括原本就在合同中的4周年终奖金，实际上发放的利润分红仅有7周的量。此外，国泰航空雇佣3.3万员工，其中八成、九成是地勤和空乘工人；在他们之间，合格工资（底薪）水平并不高（根据香港求职和职涯平台的数据，大部分月薪都在1-2万港元左右），所以工人所收到的绝对数值并不如资方宣传的高昂，实际上仅有2-4万港元左右，也就是这些工人1-2个月的实际工资。也就是说，工资增长也远远低于71%的净利润增长。这还是在最受益于繁荣的一层工人之间！

这还是发生在战争造成的物价上涨开始初步显现其后果的情况下。尽管香港在燃气、水、粮食等基本民生物资上，尚可依赖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商品而维持价格稳定，电价却已急剧攀升。随着伊朗战争的滞后效应逐渐显现，香港电灯公司已宣布自7月起将电价上调33.9%，更有前文提到的像石油寡头一类的资本家用战争造成的油价上涨作借口来哄抬物价。如果战争继续进行，持续涨高国际物价，那影响还将进一步加剧。

由此可见，当老板们在这场血腥战争中大发横财之际，为这场浩劫买单的，却是工人阶级。更要命的是，当前香港的繁荣是建立在全球大量的科技股泡沫之上的，因此今日的繁荣，也很可能转化为未来的危机，这有可能对工人阶级的生活造成更深远的伤害。

过渡纲领

在历史性的资本主义衰退趋势面前，任何周期性的繁荣都更加微弱，工人阶级也很难真正通过一般的斗争方法，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在伊朗战争、AI投机狂潮的影响下，香港经济的确有所上升。今年上半年，香港GDP强势增长5.1%，特区政府将2026年全年实际GDP增长预测由2.5%至3.5%上调至3.5%至4.5%。这一情况下的经济上升，在物质和意识层面会刺激工人阶级的发展。如今，经历了数年政治打压、经济萧条的香港工人阶级终于得到了喘息之机。稍微转好的物质基础为香港工人阶级再启斗争、争取经济权益创造了新条件。然而，要吸引这些工人活动起来、达到更高的阶级意识，抓住机会争取这些改良，革命家必须提出一系列将工人日常的感受、诉求与更高革命任务联系起来的过渡纲领。

以暴利的国泰航空为例。明明是工人阶级为62亿的纯利润付出了所有辛劳，老板却拿一两个月的额外薪水打发员工。既然国泰老板声称要“酌情”发放花红，那么就彻底公开账本，供全体工人、全社会检查，看看在老板的暴利和工人微薄的涨薪之间到底存在多少合情合理！此外还要设定滑动工资标准，与通胀水平、季度盈余挂钩，确保企业的红利能够真正地回馈那些付出辛劳的工人们。

同理，注册在开曼群岛，股东包括高盛证券和卡塔尔投资局的港灯公司，如果声称有必要大幅调涨七百万香港打工人的家庭电价，那就必须要在其工人的监督和控制下向社会打开账本，证明有大涨33.9 %电价的必要。只要有任何资本家趁火打劫的嫌疑，都是工人阶级充公公司资产让其为社会服务的论据。如果真的入不敷出，那也就表示这些资本家们也丧失了经营这种重要社会资产的资格，必须国有化并置于工人控制之下。

当然，老板是绝无可能坐视不管工人阶级从其手中夺取利润的；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工人的斗争，以降薪、纪律处分和开除等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威胁工人阶级。这就是为什么工人阶级必须形成战斗性的工会与这些老板斗争到底，并且要尽可能地将工会扩展到整个行业。

港府则更不可能容忍战斗工会挑战资本家的专制。因此，香港工人阶级必须建立一个战斗性的工人政党，组织香港工人阶级的各个部分，号召他们一起为建立战斗工会而战，甚至要跨越边境，将建立战斗工会的斗争扩展至人数众多、更受压迫的大陆地区，来向全中国的资产阶级施压，一劳永逸地保证工人争取到的权益。

这就是一条从日常诉求连接到革命任务的过渡纲领的道路——一条星火燎原的道路。

回顾黎智英和苹果日报高层判案

德斯

2026年2月9日，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裁定犯下国安法之下两项勾结外国势力罪及一项煽动罪，被判囚20年，2021年停运的壹传媒，苹果日报其他高层也被囚6年至10年。港府和中央口口声声称这个“反中乱港的主要策划者”理应受到法律严惩，而香港的自由派则悲哀年事已高的黎智英20年刑期等于死刑，香港“公民社会”沦陷了。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任何的言论和媒体自由遭受打压，坚决反对在港府和中共镇压群众的民主权利。然而，反顾香港2019年反送中运动失败，港版国安法实施近六年，民主派政党、工会溃散，必须检讨民主派的自由派领导层多方面失败：迷信外国统治阶级，误导运动进死胡同，使运动不能够连结大陆民众，香港民众也失去士气。黎智英和苹果日报在香港民主派中具有重大影响。所以香港的民主斗争要成功打倒中共资本独裁，必须要认清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代表什么。

黎智英和苹果日报

苹果日报1995年于香港由黎智英成立，以毫不掩饰与建制派敌对的民粹作风成为香港民主派代表性的报纸，高峰时在台湾、美国有分行。

黎智英常说自己出身贫寒：携带1元港币从大陆偷渡到香港当黑工，随后爬上社会梯子，1981年创立服装品牌佐丹奴，1990年售出佐丹奴股权投身媒体，2020年资产被冻结之前，身价高达12亿美元。对于香港资本家，黎智英为自己塑造了一个“白手兴家”的“勤力资本家”的形象。

苹果日报以小报（tabloid）作风报道，以煽情、色情、血腥报道区别于传统报纸，引入狗仔队文化，几度侵犯艺人隐私和作不实报道，闹出多番争议。

其中陈健康事件中，苹果日报给命案人物5000港币招妓去自造新闻材料，震动香港传媒界，黎智英更被迫公众道歉；但这种哗众取宠的风范有别于讨好中共的传统香港媒体，他们往往在官方的政治压力下，对重大社会事件报道的尺度有所收敛。

苹果日报这么受人关注，也与苹果日报的政治立场有关。在一大圈亲建制或是中立的主流香港报纸之间（如文汇报，大公报，明报等），苹果日报是为罕见公开支持民主斗争的香港报纸。苹果日报站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角度去报道香港群众事件，例如以头版赞扬群众游行，再如2003年反对香港基本法23条（港版国安法）的游行，和往年每年发生的六四烛光悼念集会。

黎智英也亲自表态支持民主派，过往捐款给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连等政党，公开指责中共，并参与民主派的游行示威。因此他留给香港民众一个民主斗士的形象，昵称“肥佬黎”。

但放眼黎智英眼中的民主却建基于资本主义的。黎智英和苹果日报声称支持真普选、中国民主化，但在社会议题上有着颇右翼的立场——支持小政府大市场，并在社会运动中协助推广亲民主派的“黄色经济圈”（和中央政府有贸易往来的，或在大陆有更多生意的，则标签为亲建制的“蓝色经济圈”），尝试以本地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抗衡大陆资本家，类似西方的BDS运动。

黎智英也拥护美国、英国统治阶级，与佩罗斯，蓬佩奥等外国政客不时擦肩，早已有遭到跟美国勾结的指控。因此，收取黎智英捐款的民主党，社民联等都受过建制派指控收取“黑金”，被美国操控等。

黎智英甚至也参与煽动反大陆移民情绪。2012年在双非儿童风波（即父母皆非香港永久居民，在香港所生的婴儿可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引起歧视新移民的政治浪潮）时，于苹果日报登反移民团体的广告，辱骂大陆移民为抢夺资源的蝗虫。

还有能够彰显苹果日报阶级性的是，苹果日报高层以资本主义牟利逻辑营运报纸。黎智英办报纸再如何反建制，他毕竟还是资本家。除了哗众取宠的报道风范之外，黎智英和苹果日报领导层也曾攻击过员工生计。如2017年，苹果日报尝试以外判形式聘请编采人员，遭到苹果日报工会动员起来反抗。显然黎智英眼中的民主，依然是资本的独裁。

但最令人深刻的，无非是2019年时代革命中，黎智英扮演的反动角色。

资产阶级的“国际线”孤立了大陆民众

2019年的返修例运动可以说是香港民主抗争的转折点。

传统来说势力比较低微、但在2014雨伞运动后渐长的本土派和港独派，在返修例运动“无大台”的情景下开始增长。一层更为愤怒的年轻示威者厌倦传统民主派和无数个游行示威对于政治斗争无能为力，他们没有明确的阶级立场，自发将行动升级，毁坏店铺和港铁设施，冲击立法会，在大学校园与警察发生武装冲突；而民主派的自由派领导层看低民众的力量，他们选择巡游华盛顿和联合国等要求“国际支援”。这篇就主要批评民主派中的自由主义领导层打“国际线”，寻求其他帝国主义支援，却最后导致“时代革命”被孤立。

“国际线”是民主派人士寻求国际支援的一个策略，名义上可能令人有国际主义的幻想——毕竟21世纪看起来是个文明、国际性、有国际法和国际团体的时代。如果寻求一些更民主的国家来协助香港人，或者在联合国的平台上光明正大的让世界仲裁，那不就能给运动带来新力量吗？于是这些自由派就飞去华盛顿，伦敦，日内瓦等，要求他国政府通过“协助香港”的措施——如制裁港府和中共的建制官员和机构——声明谴责中共和港府侵犯人权等。

“国际线”并不是2019年的新事。黎智英等领导人物与英美政客擦肩之外，民主派工会职工盟收取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资金，而民主派政客过往也经常与大纪元，美国之音等帝国主义口舌来往。

美国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早在2014年雨伞运动时被提出。甚至2016年时黄志峰访美，要求特朗普内阁官员重提法案。然而，2019年民主派的自由派领导层更为积极地投身“国际线”，当年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几幕就是黄志峰、何韵诗和罗冠聪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与美国帝国主义的大名头佩罗斯、庞培奥和布尔顿等握手。

作为民主派大人物，黎智英也如常动员苹果日报，从资本家民主角度支持示威。但随着运动拖得越长，警察和示威者行动越升级，黎智英也升级策略。毕竟身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不会联合中国大陆劳苦大众以及指出中共利用资本制度共同压迫两地，而是更加投靠外国统治阶级，企图用美帝国主义向中国施压。

黎智英在直播节目Live Chat With Jimmy表态，香港运动要得到“欧美支持”，要制裁香港和中央官员。黎智英也多次访美，如公开与民主党创立人，“民主之父”李柱铭公开访美，扬言美国和中国在打“政治冷战”，[香港为前线需要获得美国支持](#)；甚至在苹果日报头版发起“[一人一信救香港](#)”的发信行动，请求特朗普更有效地立法制裁港府和中央；也协助筹办“重光团队”，在多国登报呼吁制裁中国。

自由派乞求的“国际压力”，并非是国际民众进行阶级斗争，而是乞求外国统治阶级、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阶级与群众施加经济、外交和军事压力。作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主张国际主义，但只可以是建基于各国工人之间的国际主义。

历史上早已有美国以民主之名实行帝国主义暴行的先例——过去的三十年来，美军以民主名义把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沦为废墟，指示拉丁美的独裁政权惨杀平民，维护美国资本的霸权；近年来，我们还能看到美帝在资助以色列在中东发起战争、屠杀巴勒斯坦人，特朗普政权更是直接绑架委内瑞拉的总统，屠杀伊朗人民，加强经济封锁、扼杀古巴革命。

当今，对美国帝国主义还有迷信的政治代表只有与香港民众完全脱节的自由派。在2019年的当时，大陆民众看到这些自由派领导层呼吁外国统治阶级以一切手段打击中国，必然对帝国主义干涉感到愤怒和强烈排斥。中共又阻挠大陆群众看到时代革命的工人阶级底色，于是前者自然很难去支持香港民众斗争。黎智英这样的自由派领导可以说是亲手烧断了时代革命通往大陆群众的道路，更是让统治阶级有口实以制止外国干涉的名义镇压香港的运动。

民主派的失败，建制的镇压

当然，认清了黎智英对外国统治阶级的迷信后，我们也必须点出港府和中央对香港群众民主权利的持续镇压。港府声称近年来打击境外势力，“由乱及治，由治及兴”，建立了“爱国者治港”的新时代，但这实际上还是支持中共的资本家以更独裁的手段统治香港群众。劳苦大众反而还少了发言的渠道，更受资本主义剥削的伤害，如近期的[宏福苑大火](#)。

因此，苹果日报案的审判过程只能以荒谬形容。中央和港府把黎智英夸大成指示暴动的首脑，以“恶贯满盈”和“反华乱港马前卒”的夸言形容。案中指控他“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及“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控方证据除了上述国际线行动，还丢进访问铜锣湾书店林荣基和前港督彭定康，社媒追踪外国政客，捐钱给民阵基金等不可赦的“煽动勾结行动”。

如今港版国安法实施近六年，民主党、社民连等民主派政党和职工盟等工会被施压下解散，民主派人士和示威者不是坐牢就是流亡或忍气吞声。民主派的传统组织可谓是完全灭亡。

然而，就是因为像黎智英的民主派领导层投向外国统治阶级，藐视香港民众，对大陆民众背过身去，才导致群众运动在2020年中在香港民众疲倦、孤立的低迷环境下悲剧收场，香港二十多年的民主运动飞灰湮灭。

未来阶级斗争的教训

作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争取民主权利，但必须认清民主权利要建基于什么样的阶级基础上。

留恋民主派的香港人也许还会把黎智英和苹果高层、还有众多流亡、坐牢的自由派、本土派人士视其为民主壮烈牺牲的斗士。外国统治阶级也为他留下鳄鱼眼泪。

然而，我们必须认清香港群众运动失败的重大原因——黎智英等资产阶级自由派误导甚至损害着香港工人阶级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他们否定香港群众自己的力量，讨好外国统治阶级，并孤立于大陆民众。

随着资本制度下的社会矛盾持续恶化，香港未来再爆发大型的阶级斗争，也不能排除会再有像黎智英的自由派试图拖垮运动。

我们必须向香港的劳苦大众解释：独裁压迫与资本主义手足相连，但资本家是能够为香港争取民主的，香港群众只有靠自己阶级的力量，他们唯一的盟友也只有世界各地的劳苦大众。我们绝不能依赖这些无能、懦弱的自由派和资产阶级！

中国青年的极简生活流行小史

蕾贝卡

“断舍离”一词从2021到2024年在微博上有60.7万的超高讨论热度。这出自2025年《人民日报》旗下的一篇研究。如今在B站、小红书、豆瓣，极简主义的相关话题持续流行。例如，豆瓣极简生活小组已有约48万成员。而上面的“抠门女性联合会”小组有约70万成员，“抠门男性联合会”则有25万成员。

围绕着省钱、断舍离等内容的极简主义生活方式正在流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狂飙的电商和快递

极简主义是何时开始在中国青年工人中开始流行起来的？新华社2022年4月的一篇文章给了我们些线索。这篇题为《[为何简、简什么、怎么简？对话“极简生活”的年轻人](#)》的文章写道：

约10年前，豆瓣、天涯、知乎等网络社区刮起了一股极简风，如今，参与话题讨论的人群增长了数十倍，一些小组成员已突破36万。在网络空间里，他们讨论消费观与生活观，思考人与物的关系，分享选择极简之后的生活体验。

看来，2012年前后是一个可靠的参考点。那么，是什么物质因素促使年轻人们在2010年代开始严肃思考生活里“少也许比多更好”的这件事呢？让我们再来看其他数据。

海量的物品是通过海量的快递到达家中的。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以一亿件为单位，中国快递行业的业务总量在2007年前仅为个位数。其业务总量的第一次快速发展为2007年至2010年，快递总量从2006年的2.7亿迅速发展为2007年发展惊人的12亿件，并在2010年再次接近翻倍地达到了23.4亿件。

这是因为彼时的同一时段，开始规模化的中国的网上购物产业经历了一次大爆发。2008年，中国网购市场交易额突破千亿元。其背景是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在进出口总额占总体GDP的60%的中国，外部市场的快速恶化使得中国大量制造业濒临破产，资本家为了活命必须“从出口转内销”，这也成为党国的策略。这一策略，就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内所言，就是资本主义通过“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来试图克服生产过剩。

且彼时中国网上购物的各项要素正在迅速集齐。中国2008年为应对危机的4万亿经济刺激中，约1/3流向了铁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电网改造，哺育起中国的快递和电商产业。自此，中国资本主义严重过剩的商品便汹涌地向本国无产阶级袭来。

到了2010之后，随着网民数量的迅速扩大和网络零售的垄断竞争，网上购物在中国涨势更凶。中国快递总量几乎连年攀升，在2014年突破百亿件，在2021年突破千亿件，在2025年达到了惊人的1989.5亿件，是2010年的85倍还多。中国人均快递数量从2013年的6.8件攀升到2025年的141.6件。而如果考虑到中国网购在年龄段和地区分布上的不均匀，那么中国年轻人的平均网购件数就会更高。这就意味着透过便捷的网购和发达的物流，物品开始在中国年轻和壮年一代的家中快速囤积起来。

而就交易总额而言，继08年突破千亿元之后，中国网络市场交易额在2012年突破万亿元，连年增高之后在2025年达到15.97万亿。2026年12月中国网购人数达到9.76亿人，从2010年的1.6亿增长至此表明，中国网购用户的增长已经饱和。根据网经社相关数据，国人2025年网购人均消费为1.39万元。而彼时2006年，淘宝

网购人均年消费仅为563元，2010年为3259元。快递浪潮带来了海量商品，代价是掏空工人阶级的钱包。

所以，怪不得在经历了网络购物于2010年前的第一次爆发之后，极简主义开始流行。商品狂潮之下，年轻人当然会开始问：我们的生活真的需要这么多东西吗？而对于年轻人的问题，2020年《家庭低碳生活与低碳消费行为调研报告》给出了一些答案：

网购的便利和快捷催化产生了36%的不必要购物，其它2个主要的原因是折扣和拼单。其中，有61%的不必要购物是与网购有直接关系的，36%的不必要购买是源于折扣、促销及广告的吸收，甚至有4%是因为跟风而购买

这也就回答了另一个问题，网购的泛滥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极力推销。一份报告指出：“在多数电商业务中，营销费用往往占运营成本的比重最高。”从直播带货到平台种草，从算法推荐到低价团购，更不用提越来越多的各色购物节促销，和躲也躲不开的APP开屏广告。商品推荐在无产阶级的生活中无孔不入，不停地创造新需求，提醒无产阶级要赶紧买买买。

利润和使用价值的矛盾

但这些商品真的好用吗？人人喊打的女装设计，层出不穷的鸡肋生活小工具、各色小电器，噱头拉满但总是不让人满意也永远买不完的彩妆，便宜但充满着甲醛味的廉价家具和装饰品，不好吃的创新零食和速餐，这些商品密密麻麻地列在年轻人的购物单里，买到之后往往让人直呼倒霉。

为什么会这样？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卷解释道：

“如果生产资料在劳动过程中显示出它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这种性质，那是由于它有缺点。不能切东西的刀，经常断头的纱等等，使人强烈地想起制刀匠A和纺纱人E。就好的产品来说，它的使用属性由过去劳动创造这一点就看不出来了。

.....

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粗体为本文作者强调）

很显然，今日中文互联网上涌现出如此多的[商品测评](#)、[避雷](#)内容，且年轻人对廉价商品也愈发警惕，表明这些海量的商品经常在它们的被使用过程中总是突出表现自己“是由过去劳动创造出来”的这一点，也就是它们的不好用性，也就是他们的缺点。

为什么呢？让我们仍旧引用《资本论》的原文：

“在（资本主义下的）商品生产中，使用价值绝不是本身受人喜爱的东西。……我们的资本家……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

资本家的根本目的是获取利润，他们只是不得不依托于使用价值，在市场上透过出售商品将从工人阶级那里榨取来的剩余价值兑换成利润，从而继续资本主义无休止的逐利循环。

而工人阶级所关心的恰恰相反。我们买回物品是为了维系和提升生活品质，不良的使用价值本身就对我们的生活造成障碍：选购它们花费我们的钱财和时间，物品本身占用我们有限的生活空间，想方设法使用有缺陷的它们和清洁越来越变成仓库的家，也耗费着工人阶级下班后有限的精力。

这即是马克思主义为何始终指明，资本家并不关心社会真正的需求，而唯有工人阶级和群众才在乎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这一点上是根本对立的

但中国无产阶级的收入日渐无法满足资本家无休止追求利润的胃口。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5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012年](#)的1.76倍，远低于电商的增长倍数。哪怕抛去购物从线下转移到线上的增长要素，从中国社会财富分化来看，[根据知乎某用户的统计](#)，2025年，前1%的家庭拥有全国30.4%的财富，前10%的家庭的财富从[2010年占城市居民全部收入的45%上涨到68%](#)。

数据必然存在误差，但总体趋势却鲜明地表明，中国工人阶级是在其财富占社会总财富比例下降的趋势、也是就相对地越发贫穷的趋势中，却被资产阶级推销了更多的商品，而这增加的网购收入恰恰填满着有钱人的腰包。而阶级之间的对立压力日渐增加，也无怪乎年轻人被逼着精打细算，日渐青睐实用的“极简主义”。

极简生活流行小史

和今下社媒流行的极简主义差距较大的是它的原意。极简主义（Minimalism）作为一种抽象艺术风格本身起源于上世纪中叶，基于工业时代下设计师们对复杂、无必要装饰的摒弃。对极简主义艺术原则的最好概括来自建筑师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少即是多”。

但是，极简主义从过去的[精英阶层审美](#)，慢慢变为今天中国青年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该词的使用早已不被限于审美范畴，而是涵盖青年人的购物、家居、出行、人际，甚至婚礼等方方面面。“[把时间放在重要的事情上](#)”，这是青年人去应对社会带给他们的各种压力的一种生存策略。

那这种生存策略是怎么演变出来的呢？比起经济的走势，群众意识的分子性变化更难量化。但我们可以根据历年媒体的报道拼贴出这一进程——虽然媒体的报道总是落后于变化，因为当有文章专门分析某一现象，总是意味着该现象已经发展到不得被关注的程度。

随着极简主义在豆瓣等互联网社区野生蔓延后，2014年，“断舍离”入选《环球人物》杂志的[年度词汇](#)，其含义是舍弃不必的物品和需求。当时，中国无产阶级尚未被掏空得如此厉害，资本主义也抓住了极简主义这门生意经，推销起极简主义商品。同中国电商的廉价商品相比，设计简约且功能不错的极简主义海外品牌无印良品（MUJI）在当时迎来了[快速扩张](#)。但如今，因为无产阶级的日益贫穷化，中间阶层也开始萎缩，昂贵的无印良品哪怕连年[十几次降价](#)也无法阻止它[走向下坡路](#)。

走了一个无印良品，迎面却走来了[自2016年开始崛起](#)的拼多多。超低价是后者的标志性特征。这反映在流行词汇上，就是从2017年开始出现的“[消费降级](#)”。拼多多恰恰是表现中国制造业生产过剩的集大成者。但超级廉价的商品不仅没有帮无产阶级省下钱，反而在营销之下更[掏空我们的钱包](#)，也导致了家中杂物的堆积。[反对消费陷阱的趋势](#)出现自然也是必然的。

人际上，2019年左右，“[社交断舍离](#)”同“[无效社交](#)”开始一同成为流行词汇，这意味着青年人也开始受够了资本主义下通地被异化的人际关系。举例来说，过去经济上行期，人脉或许还能带来机遇。但从2018年左右开始，青年失业率开始[加速走高](#)，人脉也改写不了这一危机现实。社交断舍离也反映出无产阶级对有真诚的、非异化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渴望。

而在2021至2022年，“[不买年](#)”成为关键词。2021年5月，“[年轻人适合过低欲望生活吗？](#)”词条在微博获得2.4亿次浏览和1.8万讨论。另外，因为智能手机和各色工作群聊使得老板们能够进一步占用无产阶级已经很少的私人时间，以及各类入侵式的广告，使得相对的反抗性的“[数字极简](#)”趋势也开始流行。

到了2024年，连婚礼都开始被年轻人“[极简](#)”掉：不愿再为了父母看中的排场和面子破费，以自己的需求为核心，更加轻松化和个性化，告别“婚闹”等陋习。这一方面是收入下降带来的预算降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青年工人们不愿被旧家庭传统束缚、想告别丑陋风俗、想为自己服务的意识进步。

如今，因为买不起房子也就主动放弃房子负担的年轻无产者，并不仅是一味的“抠搜”，他们也在能省则省之外[更愿意为爱好和兴趣付钱](#)。超长的工时和高强度的剥削，使得青年在私人生活中更想取悦自己，但这也给了资本主义趁虚而入的机会。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更少物品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意味着更少的家务，这也符合当代打工人的[多数独居](#)、无力购房自然[租房过程会频繁搬家](#)、[极少休息时间](#)的现实。

很显然，极简主义是青年一代对社会压力的反应。他们想要在危机下少买省钱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想要更功能和审美上更好的产品，温暖的人际关系，高质量的休息时间，更高品质的生活。但极简主义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断舍离VS社会主义

年轻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如果必须通过省钱来应对不确定的就业未来，那么我们需要消灭失业和提高工资。如果需要更多的私人休息时间，那就要减

少每个人平均的劳动时间。恰好是的，如果得所有人都就业，自然每个人的平均劳动时间都会降低，并且随着AI、机器人等的发展，这一趋势自然会继续。

但问题是，资本主义的盈利逻辑反而要求最大化降低雇佣成本和最大地提高剥削强度。但如果工人能自己通过民主的方式决定社会参与劳动的人数和方式，一切都会被改写。利润不再进老板的腰包，我们的工资自然可以提升，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同步上涨。而工人阶级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控制生产资料，就要国有化它们。这些步骤所指向的经济体制，就是工人民主工人控制的计划经济。

同理，当工人真的控制社会生产，我们自然可以设计、生产出质量高和审美好的产品。如今的中国，怎么会缺乏设计人才和制造能力？这些甚至是过剩的。但他们如今却恰恰因为被盈利逻辑支配而不能服务于社会需求。

社会主义下，我们也不再需要如此多丑陋的广告，数字极简完全可以做到。人际关系也不会再因压迫和竞争而高度异化，让人避之不及。

另外，被设计和建造得更多更好的公共空间，本身就会为工人阶级间接提供优质审美教育。而我们增加的休闲时间也使得工人阶级能更多地发展自己的兴趣、潜力、满足自己对艺术和审美的需求。就如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言：

“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再荡开一笔去讲，工人阶级的极简主义实践本身也反驳了一种庸俗的担心，即社会主义下人们会不会因为无止境的欲望都可以被满足，反而会被物品所淹没。但我们在今天就可以看到，当过多的物品成为生活和社会的障碍，工人阶级会有意识地向反方向调整。所以这种担心也就不攻自破。

极简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小史，可以视为阶级斗争平静期工人以个人方式同资本主义的攻防战。青年每提出一种对抗性的生活方法，资本主义就会顺势售卖相关商品。然后青年再提，资本再

卖，无休无止。很显然，个人生活方式的断舍离并非根本办法。工人阶级真正优质生活的未来，在于透过阶级革命实现那个为了绝大多数人真正需求而服务的社会主义。

【经典】托洛茨基：斯大林因何能够打败左翼反对派？

托洛茨基

《布尔什维克》杂志的简介：

今日，许多人谈论托洛茨基与斯大林时，会轻率地说托洛茨基太过“文人”，不如斯大林“现实”。许多人或是疑问，或是讽刺地发问：**作为红军缔造者的托洛茨基，在左翼反对派时期，为何不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推翻斯大林？**比起人们臆想的政变和宫廷斗争，真实的革命与反革命进程更为复杂，根本上取决于阶级之间的角力，远远将个人的血性或“特质”等因素抛出讨论范围。如托洛茨基所言：这样一场政变的结果，势必加速左派反对派所参与反对的官僚化和波拿巴特主义的步伐。为什么？托洛茨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思考苏联蜕化的原因和出路？本刊特此转载此文，请托洛茨基亲自解惑。

原译者史骊按：本文是托洛茨基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在流亡挪威时写的。原文载于以俄文出版的「反对派文集」（BULLETIN OF THE OPPOSITION）第四十六号（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出版）。托洛茨基在本文内力图解释他为什么不派遣红军去

阻止斯大林篡夺政权。托洛茨基写这篇文章是要回答弗尔德·泽勒（FRED ZELLER）——青年团的书记，法国社会党的积极份子——的来信。泽勒因为同情国际左派反对派的观点而被社会党开除党籍。本文首次以中文发表。英文译本刊于「洲际通讯」第八卷第三十九期，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廿三日。

泽勒同志提出的问题，不单在历史上，而且在当前也是有意义的，时时在政治文献上与私人谈话中遇上这些问题，虽然提问的方式不同，大多是在私人交谈里。「你怎会和为什么会失去权力呢？」「斯大林怎能沾手于政权呢？」「斯大林的权力怎样做成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内在法则问题到处碰到，而且常常以纯粹个人的方式提出，就像是关于一次棋赛或体育比赛的事，而不是一件具有社会性质的深刻斗争和变化。在这一件事上，很多假马克思主义者与庸俗的民主派毫无分别，这些民主派当面对着庞大的群众运动时，只会应用议会走廊里的勾心斗角的标准来妄加猜测。

任何对历史有丝毫认识的人，都知道每一次革命都会跟着引起一次反革命。当然，反革命从未完全在经济领域方面将国家退回到革命前的起点去，但却常在政治成果上从人民手中取回重大的部份——有时甚至是极大的部份。像是一条普通的规律，反动浪潮的首批被害者，就是那一批在革命初期那个进攻的时期，「英雄的」时期便已站在群众的前列的革命者。这种普遍的历史现象，现在应该指导我们达到这一观念：事情并不简单地是两个和几个个人的圆滑手段或诡计多端的艺术，而是有着无可比拟的更深远的动因。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像那些浮夸的宿命论者（像里昂·布卢姆（Leon blum）和保罗·福尔（Paul Fure）等类人——他们并不否认个人、个人的主动性、个人的坚定性在社会斗争中的作用。但与唯心论者不同，马克思主义者承认，最后分析起来，存在决定意识。领导在革命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没有正确的领导，无产阶级不能胜利。但是，就算是最好的领导，在没有客观的条件存在时，也不能煽动起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最重大要求之

一，就是必须有能力去分辨出击的时刻，也能够分辨何时必须退却。就是这种能力构成列宁的主要力量。

左派反对派反官僚斗争的成功或失败，自然地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敌对方阵营的领袖的品质。但在谈到这些品质之前，我们应该清楚了解敌对阵营本身的特质，因为其中一个阵营的最佳领袖对另一个阵营可能是毫无价值的，反过来亦是如此。「为什么当时托洛茨基不使用军事机构来反对斯大林呢？这个问题——它是十分流行（和十分无知）的——却是世界上最清楚的证据，指出发问者不希望了解或不能够反映出苏联官僚战胜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普遍历史因素。我曾不止一次地在不少书籍上论及这种因素，最初是在我的自传之中。我提议以几句话来总结出最重要的结论。

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工农群众确保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而不是现今的官僚层。官僚层是在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生长起来的，它不单在革命工人行列之中，并且在其它阶级（前沙皇官员、军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中吸收其成员。目下的绝大部份官僚层，在十月革命期间，都站在资产阶级营垒那一边（只举出苏联驻外大使：保登基（Potemkin）、梅斯基（MAISKY）、托雷洛夫斯基（TROYANOVSKY）、苏里斯（SURITS）、坚曹基（KHINCHUK）等即可）。那些在十月的日子中站在布尔什维克阵营中的当今官僚，大部份都未在革命活动和其准备过程中，或者在革命初期中扮演过稍微重要的角色。这一点首先就是指斯大林本人。至于当前的年轻官僚们，他们是由老官僚选择出来和教育起来的，其中很多往往是他们的子女。斯大林成了这个在革命后生长起来的新阶层的「首长」。

工会运动在每一个国家内的历史都并不单是罢工和一般群众运动的历史；它同时也是工会官僚层形成的历史。这个官僚层所能够取得的巨大保守力量，以及它依照本身的需要去选择它的「亲密」领袖（冈珀斯（GOMPERS）、格林（GREEN）、莱芝安（LEGIEN）、立柏提（LIEPART）、西特林（CITRINE）等等）时的那种绝对不会错误的意识，是众所周知的。假如朱海西（JOUHAUX），抗拒来自左翼的攻击而至今仍成功地保留他的职位，那不是由于他是一个伟大的策略家（虽然，毫无疑问，他

是比他的官僚同袍们较为高明；他之所以能在他们之中占坐首席，不是毫无原因的。）而是由于他的整个官僚机构，无时无刻不是在顽固地为它的存在而斗争，不是在集体地选择最好的斗争方法，不是在为朱海西设想，以及向他提供必需的决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朱海西是战无不胜的。假如局势有突然的变化——走向革命或走向法西斯主义——整个工会机构就会失去它的自信，它的精巧的手法将会自觉无能为力，朱海西自己将会做出一种——出色的，但却是可怜的——表现。我们只需回忆，那些德国工会有势力而狂妄自大的领袖们，当一九一八年革命违反了他们的意志而爆发出来，以及当一九三二年希特拉现身时，他们所显示出来的可怜相就够了。

这些例子指出了官僚层的力量和弱点的泉源。它从群众运动的初期——英雄的时期——产生出来。但当它越过了群众，再解决了它本身的「社会问题」（一种稳定的存在、影响力、尊严等等）之后，官僚层越来越企图维持群众的凝固状态。为甚么要冒险呢？冒险有可能使它失去某些东西。改良主义官僚的存在和其影响的极度膨胀，发生于资本主义向前发展和工人群众相对地消沉的年代里。一旦这种消沉被打破——无论在右翼还是左翼——官僚的威力就会终结。它的机灵和技巧会变成愚昧与无能。「领袖」的性质适应于它所领导的阶级（或阶层）的性质，适应于这个阶级（或阶层）正在渡过的客观形势。

苏联官僚层比起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加起来的改良主义官僚层，是无可计算地更有力量，因为它手中拥有国家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方便和特权。真的，苏维埃官僚从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土壤上生长起来。但是，假如为了这个原故而将这个官僚加以理想化，就是最大的无知。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苏联至今仍是一个十分贫困的国家，在那里，只有一小部份人口可以享有一幢私人房舍，足够的食物和衣着——在这种国家里，大大小小数以百万计的官僚，比任何其它事情都更热衷于保证他们自己的美好生活，于是就产生了官僚层极大的自我主义和保守主义，它对群众不满的恐惧，对于批评的忿恨，想扼杀一切自由思想的丑恶耐性，以及最后，它在那个能包庇及保卫它无止境的控制和特权的「领袖」前所作出的虚伪和宗教式的跪拜。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是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内容。

当世界工人阶级遭受打击越重，则苏维埃官僚层就越有力量，这一点是毫无疑问，并且也是十分重要的。欧洲和亚洲革命运动的失败，慢慢地动摇了苏维埃工人对他们的国际盟友的信心。在国内，严重的灾难仍然在肆虐。工人阶级的最勇敢和最勇敢精神的代表，不是在内战中阵亡，就是升了职，大部份都溶化于官僚层的行列里，丧失了革命的精神。疲乏——因为革命那几年惊人的努力——没有了前景，由于一连串失望而充满了痛苦，广大的群众就陷于消极。这种反动——正如我们刚说过的——在每一次革命之后都会发生。十月革命——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的历史进展，在于疲乏和失望并未使阶级敌人、资产阶级和贵族得到益处，而是由工人阶级的上层和与它一起加进苏维埃官僚层去的中间阶层获得益处。

苏联的真正的革命无产者们，并非从国家机关，而是从革命群众的活动中获得力量。特别是，红军并不是由「国家机关的人员」创造出来的（在那些最重要的几年，国家机关仍然十分薄弱），而是由集合了年轻农民，并领导他们作战——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之下——的英雄的工人干部创造出来的。革命运动的退潮、疲乏、在欧洲和亚洲的失败、工人群众的失望，都无可避免地和直接地削弱了国际主义革命者的地位；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加强了民族的和保守的官僚层的地位。革命遂展开了新的一页。前一段时期的领袖变成了反对派，而国家机关的保守政治家们，他们以前在革命中曾扮演过次要的角色，现在与胜利了的官僚层一起站在前列了。

至于军事机关，它是官僚机关的一部份，与它并无质的分别。只须说明，在内战几年里，红军吸收了数以万计的前沙皇军官便足够了。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三日，列宁在彼德格勒的一次会议中说：「托洛茨基最近告诉我，说军队里我们的军官数目有几万人，当时我对于利用我们敌人的秘诀的意义，心里就有这样一幅具体的图画：必须利用我们以前的敌人来建设共产主义；以资本家收集起来用来反对我们的砖头去建设共产主义！而我们并没有其它的砖头！」（列宁全集，一九三二年俄文版，第廿四卷，速记员报告，第六十五页）。这些军官和行政干部，最初几年是在先进工人的直接监督之下进行工作。在残酷斗争的烈火中，根本不会有军官特权地位的问题，这个名词在当时字汇中是不存在

的。但在取得胜利，走向和平局势后，军事机关就设法把自己变为整个官僚机关的最富影响和最具特权的部份。想依靠军官去掌握权力的人，就是那些准备进一步推进军官阶层的欲望的人；那就是说，就是那些能向军官保证更高地位，给予他们官阶和勋章的人；换句话说，亦即就是那些能以一次行动，就能做出斯大林派官僚层在连续十至十二年内所能推前的工作的人。毫无疑问，进行一次反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等人的系的军事政变是有可能的，而且不会有困难，甚至不会流一滴血；但这样一场政变的结果，势必加速左派反对派所参与反对的官僚化和波拿巴特主义的步伐。（整段为《布尔什维克》杂志所加粗强调）

基于它自己的本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任务不是依靠军事官僚去反对党的官僚，而是依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且通过它去依靠人民群众，以控制整个官僚层，清洗它的异阶级份子，保证工人对它的清醒的控制，并且将它的政策重新纳入革命国际主义的轨道去。但是，群众的革命力量的生命泉源已经在内战中涸竭，饥荒和传染病、官僚的数量和傲慢都惊人地生长，革命的无产者变成软弱的部份。可以肯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曾经集合了数以百万计最优秀的革命战士，包括军事人员在内。先进的工人是同情反对派的，但同情仍是消极的，群众不再相信通过斗争就能深刻地改变形势。当时，官僚层断言：「反对提倡国际革命，并且准备把我们拖进革命战争之中。动荡和灾难已经够了。我们已经争取到休息的权利。我们不再需要『不断革命』。我们将会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工人们和农民们，信赖我们——你们的领袖——吧！」这些民族的和保守的鼓动——略略说一下吧——是以疯狂的（有时是绝对反动的）对国际主义的诬蔑来完成的。它把军队和国家官僚紧紧地拉在一起，并且毫无疑问地从疲倦的和落后的群众中获得响应。因此布尔什维克先锋队发觉到自己处于孤立和瓦砾之中，特尔米多官僚的胜利的秘密就在于此。

说到斯大林的战术上和组织上特出的才干，这只不过是一个神话，由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官僚刻意塑造出来，并由资产阶级左倾知识分子重复地背诵着；这些知识分子们，不管他们的个人主义，却极愿意向成功下跪。这些绅士们，当列宁被各国的渣滓追捕时，他们却不承认列宁正在准备着革命。反

之，当这些承认会带来满足，有时甚至是直接的利益之时，他们就「承认了」斯大林。

首先发动反左派反对派斗争的人并非斯大林，而是季诺维也夫。最初，斯大林还在犹疑和等待中。认为斯大林从开始就已有一个策略性计划是错误的。他只是在不断探测地基。无疑地，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导仍残留在他身上。事实上，他谋求一个更简单的、更民族性的、「更有保证的」政策。成功之降临到他身上是意外的，他自己本身最初的感觉亦是如此。这是新的领导层和革命贵族的胜利，他们企图从群众的监督下解脱出来，并且在它的内部事务上，需要有一个有力的，可依赖的仲裁者。斯大林——无产阶级革命中第二等行列中的一个人物——于是便成为特尔米多官僚层的公认的领袖；首先是在官僚层的基层内——而且仅此而已。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或半法西斯主义作家马拉柏特（Malaparte）出版了一部书，名为**政变：革命的技术**。在书内，他引伸出一种观点：与列宁的战略相反，「托洛茨基的革命战术」在某种条件下，在某个国家里，能保证胜利。很难想象出会有比这个理论更为荒谬的了！但无论如何，这些放马后炮的聪明人士，指责我们因为优柔寡断而失去了政权，归根到的他们是用马拉柏特的观点来看事物的！他们认为有某些特殊的技术「秘密」，有了它就能取得和保有革命政权，而与下列巨大的客观因素影响无关：东方和西方革命的胜利和失败，在一个国家内群众运动的兴衰等等。政权并不是最佳「技术」优胜奖状。政权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最后分析起来是阶级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曾说过的，政府的领导层是成功的有力的杠杆，但这完全不意味着领导层能在任何条件下保证胜利。

最后分析起来，决定性的是阶级斗争，以及在进行斗争的群众之中所产生的内部变化。

假如列宁在生，斗争会如何发展呢？肯定地说，以数学符号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不可能的，从他的生命的最后时期里一系列的信件、文章和提议之中，尤其是从他的「遗嘱」所提议撤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位，并且在最后一封信中「与斯大林割断一切私人 and 同志关系」，这些无可争辩的方式中，十分明显

地指出，列宁一定会成为那个贪婪保守的官僚层，和逐渐凝聚力量的斯大林政策的不可和解的敌人。在他遭受两次病痛期间，列宁向我提议共同组织一个派别，进行斗争以反对官僚层和它的总司令部——斯大林指挥下的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列宁——用他自己的语句——正在为第十二次党大会准备一个反对斯大林的「炸弹」。所有这些——在精确的和无可争辩的文件的基础上——都在我的自传和一篇文章：「列宁的遗嘱」中说过了。从列宁的准备措施来看，显示出他是认识到这个特出的斗争将会是十分艰苦的；不是——对这点是没有怀疑的——他**个人地**惧怕斯大林成为他的敌手（这样说是可笑的），而且他清楚地看到斯大林背后，领导官僚那个有力的阶层所占有的共同利益的器官。当列宁仍然在生时，斯大林就进行着一项挖墙脚的手术，通过阴谋份子的媒介，小心地散播谣言，指列宁是一个有缺陷的知识分子，与局势没有接触等等；换句话说，流传着目前成为共产国际非正式的意见的同一个传说，为了解释列宁最后一年半里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尖锐敌对。而事实则是，当列宁患病时所写的文章和信件，代表了他的思想最成熟的果实。这个「有缺陷的人」的聪慧，超过一打的斯大林。

可以这样肯定说，假如列宁能够活久一点，那官僚的万能所使出来的压力——至少在最初几年——会比较轻一点。但在一九二六年，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妻子）向一群左派反对派说：「假如列宁今天仍在生，他现在会在监狱里。」列宁的恐惧和警告性预兆仍然新鲜地在她的记忆里，而她对列宁个人的卓越才干绝无幻想，她——以她的说法——很明白，最好的舵手也要对风和对顺流或是逆流作出依赖。

这是否意味着斯大林的胜利是无可避免的呢！这是否意味着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斗争是毫无希望的呢？这样子提问题是抽象的、图式主义的和宿命论的。斗争的发展，经已毫无疑问地展示出在苏联要取得全面的胜利——那就是说，夺取政权和烧焦官僚主义腐败的根源——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在**没有世界革命的支持**之下，是不能也不会办得到的。没有了反对派勇敢的批判，没有了官僚对反对派的恐惧，则斯大林布哈林走向富农的道路，可能会以资本主义的复辟来终结，在反对派的鞭策下，官僚层从我们的政纲里取去了重要的借镜。列宁主义者并不能从堕

落的过程里挽救苏维埃政权，也不能挽救个人权力的困境。但它阻止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拯救了苏维埃政权不至全面解体。官僚层的进步的改良是反对派革命斗争的副产物。对于我们，这是远远不足的，但仍然是一些东西。

在全世界的工人运动范围里面——对这个运动，苏维埃官僚只是间接地依赖它——形势对于苏联仍然是十分之不利。通过共产国际为中介物，斯大林主义成了世界革命的最坏的制动机。没有斯大林，就可能没有希特勒。目前在法国，斯大林主义以政治上名为「人民阵线」的屈服政策，正为无产阶级准备着一次新的失败。但在这里，左派反对派的斗争同样不会是无所作为的。整个世界都培养着和增加着真正无产阶级革命的干部，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并不为了苏维埃官僚的权力和财富而参加进去，而是为了列宁的纲领及十月革命的旗帜。在帝国主义、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联合力量的真正庞大迫害之下——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正在生长、加强他们自己，并且逐渐地取得先进工人的信任。正在形成的一个不朽的危机象征，就是塞因（即法国——译者）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大发展。世界革命将会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前进。它的第一次成功，将不会给斯大林私党的万能、它的流言，它的诽谤和它的空洞声誉留下任何支持。苏维埃共和国，像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一样，会最后从官僚的魔爪之下将自己解放出来。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性瓦解早已注定了，这将是它反对世界工人阶级的无数罪行所应得的惩罚，我们并不希望和等待其它方式的清算！

【转载】无产阶级文化论批判：从波格丹诺夫 到斯大林主义

左辽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著社会压迫、经济剥削、和文化异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在巨型垄断集团的阴影下，无数赤贫者是要么活在缺衣少食、饥寒交迫的绝对困境中，要么就是像许多小业主一样被各类债务缠身，终生不得安宁。这样的环境下，文化和艺术在一个层面上是少数富人的玩物，只表达资产阶级的品味和情趣，而劳苦大众的心声和思绪往往被忽视、压制。另一个层面上，文化和艺术有时更被降低、庸俗化，用来维护整个资本主义的压迫性体制，使得文化和艺术成为了劳苦大众精神的鸦片、奶头乐，继续压制无产阶级的精神发展。

而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中，文化和艺术会是什么样的？历史上每个统治阶级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因此也创造了自己的艺术；无产阶级也会经历一样的发展吗？以及，一个工人国家在文化和艺术领域应该做什么？这些问题肯定会引起任何好奇的左翼理论的学习者，和任何希望见证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兴趣。

不幸的是，自1910年代始，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的唯心主义者和他们斯大林主义的同伙严重扭曲了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些问题

的正确分析和解答。他们的一些严重错误遗臭至今、流传广泛，甚至使得当代部分真诚的革命者在文化和艺术问题上转向了政治上的代替主义、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和艺术上的庸俗主义这一系列错误的、危险的、和有害的政治倾向。从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领导的前进派开始，波格丹诺夫后来与卢那察尔斯基于十月革命前夕创办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无产文协，Пролеткульт，Proletkult），再到无产文协在1920年代衍生出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岗位派；RAPP，НаПосту，Na Postu）、锻冶场（Кузница，Kuznitsa）等组织，最后延伸到斯大林、日丹诺夫（Zhdanov）、拉狄克（Radek）、布哈林（Bukhrin）、高尔基（Gorky）领导的全苏作家协会，本文将概述的这一系列组织错误的立场和实践，以及其中严重的哲学和政治问题。之后，本文还将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这一段历史加以分析，以阐明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中真正的革命立场。

反动时期的唯心主义

最先将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哲学这些概念引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是波格丹诺夫领导的前进派和卢那察尔斯基推动的造神运动。在俄国1905年革命后的1907至1910年这一反动时期，布尔什维克被政治、社会的压力冲击，陷入派系斗争。在此期间，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一批前布尔什维克党人（如马克沁·高尔基、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关键而错误地转向了各种相互关联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创造了许多当时流行一时的错误理论：甚至像布哈林这样的著名理论家也深受影响，虽然他并不是这个小组的密切成员。这些人和他们反动的思想在被布尔什维克敏锐地察觉到、然后被坚决地排斥出党后，后来在1909年形成了所谓的前进派（Вперед，Вперед）小组。

基于哲学唯心主义，前进报及其附属成员积极宣传了各种根本上是谬误的一大串思想和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就是波格丹诺夫鼓吹的所谓“经验批判主义”。波氏试图通过将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作为其认知论的中心，并以“无产阶级哲学”为名做掩护，尝试将马克思主义（即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与马赫主义（即混乱的主观唯心主义）相缝合。关于波氏的唯心主义哲

学，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其中列宁已做过充足的揭露和批判，彻底抄出了这种折中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混乱、含糊、反动性质。

至于无产阶级文化理论的开端，第二个相关的理论来自卢那察尔斯基。卢氏通过将共产主义运动视为一种文化、艺术运动，就像“基督教、佛教或希腊多神教”的艺术一样，首先提出了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的艺术这一概念。此外，在同一篇文章中，卢那察尔斯基——在没有具体的、辩证的历史分析的情况下——应用了一个机械的公式，即无产阶级应该像贵族或资产阶级一样拥有自己的艺术。[1]更错误的是，在他的两卷《社会主义与宗教》一书中，卢那察尔斯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之间同样唯心主义的结合：“【科学社会主义】是所有宗教中最宗教的，而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是所有人类中最虔诚的宗教份子。“显然，这些前进派份子已经远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取而代之的是某种形式的哲学唯心主义。

前进派的成员不仅创造了这些根本上是唯心主义的概念和理论、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机械而僵硬的拙劣理论模仿，其中一些人甚至进一步将这些错误的理论付诸实践。最著名的例子还是来自于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这次加上了高尔基。在波格丹诺夫的带领下，这些前进派份子以创造、宣传“独立的知识性无产阶级文化”为理论基础和实践目标，进行了两次实验。他们在偏远的两座意大利小镇卡普里（Capri）和博洛尼亚（Bologna）为移居国外的俄侨工人建立了两次“党校”。

然而，对波格丹诺夫来说，这两个党校并没有为他带来政治胜利。在俄国革命运动中，海内外只有寥寥数人、几个小组支援；同时，前进派混乱的哲学理论和政治纲领也仅仅吸引来了歪瓜裂枣般的成员，而其组织内部的理论存在高度的异质性。这一切的一切都促使波氏最终与前进派中各类份子决裂，并最终在1912年解散了前进派，并退出政治。

然而，前进派的解散并没有终结这些不同的唯心主义流派的流传和延续，它的解散只表面了这些思想的暂时撤退。在波格丹诺夫和其他人的详细阐述和大力宣传下，与波氏同质的、类似的无产阶级文化理论还在未来数十年中反复出现，并借由其他人之手

继续发展。而波氏也在持续关注、写作著劳工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继续发展他建立纯粹工人的文化的主意。

为了说明波格丹诺夫和其他人之间在理论上、政治上那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我们可以从波格丹诺夫这个源头上观察是这些观念和理论是如何阐述的。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欧洲工人阶级对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国家的那种爱国主义支援，波格丹诺夫写道：

“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大多数工人也自愿跟随资产阶级，承认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利益高于他们的阶级利益，与本国资本家缔结和平、联盟……为什么？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难题，他们没有一种足够深刻和综合的教育来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从自己的任务和自己的理想的这一角度出发，来坚定而果断地解决这个问题。由于没有足够的力量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工人阶级向资本主义世界屈服了。”[2]

换句话说，对于波格丹诺夫来说，整个问题都归结为工人阶级的意志薄弱、缺少一种独立的工人教育，而不是其领导层致命性的背叛。他大眼一闭，忽视了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的背叛，而这个国际是当时欧洲工人最强大的政治领导。正是这个腐朽的工人国际召集了全欧洲的劳动群众参加1914年始那灾难性的帝国主义大战，鼓吹沙文主义并反对国际主义，破坏了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和阶级独立。相反，他指出的问题，居然是在于缺少一种纯粹工人的教育。而在他看来，这种纯粹工人的教育是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必要的阶级意识的唯一条件。因此，难怪波格丹诺夫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解决方案是：

“要对【无产阶级】进行全面教育，明确引导集体意志和集体思想，只能通过打造一种自主的知识性文化来实现。资产阶级拥有它——他们的力量就在于此；无产阶级缺乏它——这就是它的弱点。”[3]

这些观点没有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革命时代的物质差异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只是胡乱地给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套用了公式。历史上，由于欧洲资产阶级是从贵族阶级的封建统治中自发长出自己成熟的经济基础，并与贵族阶级并存了很长一段时间，欧洲的资产阶级甚至在成为独立的统治阶级之前，就已经获得了足以影响文化艺术的财富和权力。换言之，因欧洲资产阶

级在历史上其独特的阶级特征，它有非常充分的物质条件和时间能够在封建主义的统治之外创造出自己的“自主的知识性文化”。当然，历史的发展是灵活的。不是每个民族国家的资产阶级都能像欧洲资产阶级相对独立地创造出自自己民族和阶级的“自主的知识性文化”，但是每个民族国家的资产阶级目前都在运用着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文化来执行着资本主义的压迫性统治。打比方说，统治日本资本主义的“知识性文化”就是东方和西方文化的结合体。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是一个贫困的、政治上和文化上受高度压迫的阶级，因此获得先进文化的手段和方式都要少得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无法完全掌握那个时代的文化、艺术成果。即使在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改革以向无产阶级让步的国家，工人阶级也永远不会像资产阶级那样成为富裕阶级，也永远不会控制文化和教育机构以及其中的文化生产资料，更不会像其敌对阶级那样获得成熟的教育。那么，从无产阶级之中，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饱受压迫和苦难的无产阶级建成这种“自主的知识性文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要在整个社会层面完成这样的任务，就需要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一个为已的工人政权，才能夺取这些文化生产资料来全面地教育自己。可以看出，整个无产阶级文化的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必然走向破产的。

结合实际情况来看，波格丹诺夫错误连篇的理论和解决方案显然倾向于保守的改良主义立场——因为工人缺少文化，所以（谁？大概是革命家）得想办法先教育全体工人阶级，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那么，下一步就是如何在当今的（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下创造一个工人阶级的文化来教育工人了——毕竟据他所说，如果没有成熟的、自主的工人文化，社会主义革命就永远不会发生。但实际上，就如先前证明的，在任何资本主义的社会中，这种条件都不会成熟。那么，根据他的说法，革命就永远不会发生。事实上，他也是这么想的：在十月革命后的1917年12月2日，他写信给卢那察尔斯基，先是愤世嫉俗地谴责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然后声称社会主义革命永远不会在欧洲发生，因为那里的工人“缺乏文化的水平和组织”。[4]但显然，1917年至1926年间，那席卷全欧洲的革命浪潮是正正好打了波格丹诺夫一记耳光。虽然这一系列革命的失败了，但其

中的教训再次强调了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的那真正紧迫的任务：建立一个与劳动群众并肩作战、能够领导他们取得历史性胜利的国际性革命领导团队。

此外，在波格丹诺夫这个貌似是取悦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文化理论背后，实际上还隐藏着一个代替主义的倾向：就实践而言，在资本主义下的经济、社会环境下，由于无产阶级受到的压迫过深，创造一整个社会的文化和艺术这种极端复杂而庞大的工作必然不会直接是被异化的广大无产阶级的工作，而是依附于其的、有教养的资产阶级或是小资产阶级份子的工作。那么很明显，按照这个思路继续实践，结果就必然是让一小部分小资产阶级份子代替无产阶级，企图创造一种实际上是脱离无产阶级自发的创造力的伪无产阶级文化。悖论的是，改造文化和艺术所包含的任务是整个运动中的社会才能完成的，而这种一小部分人进行的孤立的文化创造只是不过是杯水车薪，永远无法治好、补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造成的社会异化所带来的精神创伤和文化缺失，更绝非是真正的、一整个社会的文化。这种无产阶级文化理论，永远无法在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这一基础上建成一个真正属于群众自发创作的文化和艺术。它实际上推崇的是一条代替主义路线，即一小部分人代替群众发展文化这一错误的政治路线，而这一路线正是后来的斯大林主义继续延伸发展的。

简而言之，波格丹诺夫的无产阶级文化理论显然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以机械的角度观察历史，误以为工人阶级会重复资产阶级的文化、知识发展——这种看法首先是肤浅的；由此，他企图创造一种可以独立于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自主的知识性工人阶级文化”，但是实际上却以小资产阶级为其政治运动的社会基础。因此，这种实践撞上的却是资本主义社会无穷无尽的压迫环境，这个理论既无法引导建成无产阶级文化的实践，也无法真正启发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更不可能促成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彻彻底底是错误的、无效的、而且是反动的理论在1910年代失败后，似乎就要由此消亡了。然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推翻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统治。讽刺的是，这一史无前例的革命发展却给了这种错误理论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工人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下再一次发展的机会。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早期苏维埃国家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亲自参与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简称无产文协）的成立。而正是通过无产文协，波格丹诺夫的无产阶级“自主的知识性文化”思想再一次开始广泛传播，造成了深远的文化和社会影响。这次，在新的工人国家中，这个理论的影响力达到了更高的水准，也随着俄国革命环境的恶化，而将自己潜在的代替主义路线继续延伸出来，并宗派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手中成熟。然而，无产文协从一开始并非这些份子的人工创造。无产文协——最初由工人阶级运动中分散的艺术、自我教育组织组成——是1917年俄国革命期间阶级斗争动态过程的中间产物。

在二月革命之后、十月革命前不久，旧的沙皇国家机器崩溃了，反动的临时政府仍然保持着政治的混乱，并越来越转向反革命、反工人阶级。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和教育领域的各种工人组织自发地放弃了临时政府，转而主张独立于资产阶级政权之外继续工作。而这时，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现在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等其他一些前革命党人对这些组织的干预，使得这些组织合并成为一个独立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全国性的工人阶级文化、教育组织，史称无产文协（Пролеткульт）。

在十月革命后，卢那察尔斯基被选为第一任苏俄人民教育委员，负责文化、艺术、教育事务；在他的领导下，苏维埃国家资助了无产文协，但仍允许它保持完全独立于苏维埃国家。在整个内战期间，无产文协逐渐不再仅仅是一个在劳动群众中自发宣传的艺术组织，而逐渐成为了一个庞大的文化机构和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社会运动，吸引来了包括普通工人、实验先锋艺术家和文化知识分子在内的数十万人参加。就艺术家的水准而言，无产文协的确吸引来了一些能人巧匠，例如以下三位著名的艺术家，谢尔盖·爱森斯坦（电影导演）、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小说家）和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诗人、画家）。就出版量、组织范围、人数而言，无产文协在1920年达到了顶峰，出版超过15种不同的期刊，并在苏维埃俄国设有300个地方分支机构，拥有大约400,000名成员。[5]无产文协甚至在1920年8月在共

产国际的说明下开始建设一个国际支部，名为“无产文协国际”（Kultintern）。[6]总的来说，在整个俄国内战期间，无产文协在革命俄国的文艺界逐渐变得极具影响力。

然而，无产文协尽管影响广大，但其缺陷也是非常严重的。相反，到1920年内战逐渐结束时，它在政治上的问题表现得越来越严重。如前所述，该运动的领导主要由波格丹诺夫和卢纳察尔斯基等前前进派成员组织，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理论在无产文协的整个运作期间扎根在了许多无产文协的成员之间，而这一情况导致了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受波氏“自主的知识性工人文化”这一理论思想的影响，许多无产文协派领导和成员倾向于一条错误的路线：即从小圈子、小团体中立即从无产阶级自身中创造出一种完全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声称，只有纯粹的工人阶级组织才能推进无产阶级专政。

实际上，这些主张存在很大的政治危险。不言自明的是，它们首先在实践上对革命联盟的力量（工、农与小资产阶级之间）造成分裂，并且最重要的是，它们在理论上与辩证唯物主义不相容：虽然毋庸置疑的是，文化这种社会生活的产物首先受到物质经济社会条件的约束，但是其具体的形态却是在无数人劳动的影响下确定下来、并且不断发展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施加劳动的人将改变文化，而崭新的文化也将改变无产阶级。这就像自然界中动植物是如何演化的。取代这个有机的演化过程，就是用一小部分人创造的一些文化作品和风格，来取代无数群众文化生活的自发发展。这样的路线违背了无产文协派取悦群众的美好愿望，更违背了文化和艺术健康生长的社会规律。

事实上，他们通过孤立的“无产阶级”工作室和实验室立即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这种广泛的、空想性质的实验经常产生艺术价值上值得怀疑的作品，尽管其政治上表现得极其革命。托洛茨基在1923年仔细评论了一些这类作品的品质和性质：

“毫无疑问：无力的、平淡的、甚至文理不通的诗句可以表明一个诗人和一个阶级政治上成长的道路，也可能具有难以估量的文化征兆意义。但是，无力的、而且是文理不通的诗句，不可能构成无产阶级诗歌，因为它不可能构成任何诗歌。

.....

在革命斗争的条件下……知识份子并不掩盖反而竭尽全力地表明倾向性，他们经常在艺术中牺牲艺术本身，如同他们牺牲其他许多东西那样。”[7]

同样的，从列宁到托洛茨基、克鲁普斯卡娅，最后甚至是卢那察尔斯基本人，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逐渐确信，许多无产文协的文艺作品艺术价值可疑，一些甚至是“牺牲了艺术本身”，并不能为工人阶级提供充足的教育，因此，在内战后的大规模毁坏之后，他们的活动显然是经济上浪费的。更重要的是，就文化、艺术方面的政治路线而言，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完全反对许多无产文协成员宣扬的那种草率的、空想的文化理论。在拥有一亿多文盲的苏俄，在文化领域最紧迫的革命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群众的文化素养，而这个缓慢的过程就必然需要耐心地、批判性地根据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改造旧统治阶级留下的知识。他们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正如列宁解释的：

“对那些过多地、过于轻率地侈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我们就不禁要抱这种态度，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我们许多年轻的著作家和共产党员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8]

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9]

在理论上，正如托洛茨基也完全同意列宁的意见：

“认为每个阶级都能完完全全地从其内部产生出自己的艺术，比如说无产阶级能通过封闭的艺术讲习班、小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等创造出新的艺术，这种想法是孩子气的。一般地说，历史的人的创作就是继承。每一新的上升阶级都站在其前驱的肩头上。但这是一种辩证的继承，亦即通过内部的排斥和决裂而实现的继承。”[10]

随着无产文协开始在国际上扩张，列宁、卢那察尔斯基和苏维埃国家最终决定进行干预，并将无产文协引导到一条更实际的政治路线上。然而，与资产阶级学术界对他的百般诽谤相反，列宁并没有在文化、艺术领域推行“专制”、“胁迫”、“强硬”的政策。例如，当代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里德（Christopher Read）错误地指责列宁“不会容忍任何领域的自治。”[11]另一位当代历史学家在名为《与俄国革命同行》的一本论文集中声称，无产文协的自治违背了“列宁的信念（？）”，即党应该在所有领域都应称霸（！？）”。[12]这些胡说八道显然是对列宁和早期苏俄政府的曲解或恶毒诽谤。事实上，列宁的苏俄政府虽然没有实行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但即使是在残酷的内战期间，这个政府也在艺术事务中也扮演了总体上是友好的革命监督作用，很少采取强制措施——“只是在对明显的资产阶级倾向作斗争方面保持领导作用”[13]。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手段不仅没有压制言论自由的权利，反而以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的方式扩大了对劳苦大众对出版的和文化的生产资料的控制，极大地扩展了劳动群众的表现和文化自由：在革命后，是普通劳动者控制了出版社、图书馆、剧院、美术馆、博物馆、学校、大学和其他文化教育设施及相关生产资料。

在无产文协的这一情况中，列宁再次在艺术领域贯彻了苏维埃国家的两个关键原则：争取亲革命或中立的同路人（知识份子）；鼓励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艺术作品。他所做的，不是像斯大林一样，将一种单一的官方美学理论强加给所有艺术家。

列宁对无产文协的干预始于1920年10月的全国无产文协大会，他亲自与会，并在会上说服代表们，需要将他们一些活动置于工人国家的控制之下。1920年10月12日，无产文协大会被说服，并一致通过了将其教育部门与教育人民委员部合并的决议。[14]后来，当一些无产文协的领导人指责国家试图解散他们的组织时，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领导下，于11月10日耐心地再次澄清，只有涉及科学和政治教育的部门才会被转移到国家教育机构中去，而无产文协“在艺术（音乐、戏剧、造型艺术、文学）方面的工作仍保持自主权”。[15]为了确保无产文协的成员们放心，十二月，列宁向党致辞说，他们并不打算限制“工人

知识份子”，布尔什维克必须为艺术家创造“最健康和正常的条件”，以便在艺术创作中“富有成效地体现”。[16]

列宁和早期苏维埃国家所做的，恰恰是1920年作为人民教育委员工作到1928年的卢那察尔斯基对苏维埃国家在艺术领域的政策所解释的：

“不言而喻，国家无意把革命的思想 and 革命的情趣强加给艺术家。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只能生产革命艺术的冒牌货，因为，真正艺术的首要品质是艺术家的诚实。然而，除了强制的形式，还有其他的形式：说服、奖励和培养新的艺术家。为了获得革命的艺术灵感，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一定要采取的。”[17]

事实上，直到1920年代后期，列宁于1923年去世，左翼反对派被斯大林及其追随者清洗后，斯大林主义的苏维埃国家才建立了对文化、艺术事务的绝对控制权。有趣的是，尽管无产文协自1920年以来不再接受国家补贴并随即衰落，协会一直坚持合法运作到1932年，是同所有非官方的文化组织一起是被斯大林取缔的。[18]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革命传统为之奋斗和捍卫的文化、艺术政策，正是这种在友好的革命监督下的艺术表达自由；而斯大林则是在文化、艺术方面完全与列宁、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分离，沿着波格丹诺夫的路线，彻底抹杀了艺术的表达自由。

接下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衰落与斯大林主义在文艺领域的兴起之间的这段中间历史，将揭示斯大林的文化政策与波格丹诺夫的无产阶级文化理论之间重要的历史、理论和政治联系。在1932年之前，前无产文协的成员已经创建了一些后生组织，而这些组织则帮助了堕落中的苏维埃国家渐渐违反不要过度干预艺术领域的这一规定。这些组织的关键理论，关键思想，在后来虽然在被名义上被斯大林政府否定，但是其理论内核实际上则被吸收进了自身的文化政策。

前无产文协派和斯大林主义

在无产文协衰落之后，在整个20年代，许多前无产文协派陆续地自立门户，但却还是师从波格丹诺夫，传承了基本相同的“无产阶级自主的知识性文化”的这一理论思想，并以此为基

础建立了各种其他艺术、文学圈子和组织，他们不仅继续宣传类似的理论思想，但也更进一步，要求苏维埃政府以“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风格对文学、艺术实行法律上的垄断。锻冶场（Кузница, *Kuznitsa*）就是这样一个从无产文协中脱离出的同质性组织，他们白纸黑字地要求工人国家垄断无产阶级风格。他们的要求自然遭到布尔什维克的强烈否决。锻冶场成员在1920年成立了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又称伐普，*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Пролетар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即后来在1925年之间成立的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RAPP，又称拉普、岗位派）的前身。自1923年新经济政策启用之后，拉普很快成为了对失望的无产阶级作家的坚实据点，并长期从极左的角度讨伐政治上是中立的甚至亲革命的其他一系列艺术和文学倾向、运动和团体。在1925年的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即拉普）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们同样地通过了一项决议，称在对农民的统治中无产阶级不能容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必须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还要求苏维埃国家“夺取艺术领域的统治权”。[19]这种悲观、急躁的胡言乱语最终再次被布尔什维克驳回，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不能向任何一个群体提供垄断，即使是其意识形态内容上最无产阶级的小团体。这样做将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学本身的毁灭。[20]

但在拉普这里，我们已经在他们的说法中发现了一种程度非常之深的保守观点。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长时期”[21]，这个阶段不是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暂时的、过渡的时期，因此为了保卫、维持工人国家，必须要无产阶级有一种属于本阶级的文化、艺术——就像资产阶级有的一样！这个观点，完完全全是波格丹诺夫的老调重弹。如果我们将拉普的”无产阶级专政”与波氏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术语平行对比，就会发现他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即，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文化、艺术，那么无产阶级就无法像资产阶级那样达到（或维持）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这个说法完全忽视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分别，不能理解俄国革命将如何摆脱困境，只是屈服于对困难的现状那种短视而狭隘的观察，他们更不能理解无产阶级将如何从无产阶级专政（即国

有化计划经济的工人国家）转向社会主义时期（阶级社会消解中）并进一步消解阶级社会。

岗位派采用了错误的分析手法，因此看不见真正的解决方法，即国际革命。只有一个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联盟才能够为国际的无产阶级提供在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健康、有机过程。在这一条件下，无产阶级将能够通过由下至上的民主计划经济——这一生产方式的彻底更新——来保证物质条件、社会条件的改善，逐渐将自身从雇佣劳动中以及因贫困而产生的文化异化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时期，生长出的无产阶级将在下不再是无产阶级，而将会是自由的人。

当然，一切意识的产生都与物质层面的变化脱不开关系。我们或许可以对岗位派机械的、狭隘的哲学和历史观进行斗争，但这些工人艺术家的意识的确是革命中的落后阶层对当时俄国革命悲剧情景的观察：尽管俄国的工人政权得以维持和巩固，但是物质上遭到了国内两次战争的严重毁坏，使得1923年布尔什维克不得不采用新经济政策；匈牙利、德国革命数次的失败，使得国际革命也陷入低沉。这一切对于这些急躁的工人艺术家而言，国际社会主义的前景似乎非常渺茫了。因此一切扭曲的意识都在政治的层面上都找得到来源了——这是一种对革命前景的失望。这种失望歪曲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错以为无产阶级专政将会、也能够持续很久。这种为工人政权延长（实际上是永久化）专政国家机器的论调，更表现出俄国工人阶级中出现了对社会的前景越来越不看好的一些落后部分。不幸的是，随着列宁和托洛茨基等革命领袖的离开，以及他们的布尔什维克传统被清洗，这种落后思想最终愈来愈上升到了国家政府层面，腐化了其领导层。苏俄政府也最终变成了官僚机构对工人阶级的经验主义波拿巴专政，而这些政治倾向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去甚远。由此，从这种落后阶层中汲取社会基础的、以斯大林为首的这种反动趋势使”无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这一理论毒草开始复活了，他们将其注入俄国的文化、艺术和无产阶级——而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则是曾拼尽力气地试图阻止这一悲剧发生。

就像许多无产文协派一样，斯大林主义者也出于意识形态的伪连贯性，名义上拒绝了波格丹诺夫的唯心主义。然而，他们

不仅是陷入了波格丹诺夫所犯的理论错误，而且还扩大了他的错误连篇的理论，将其中隐藏的代替主义和庸俗化倾向延伸出来，并应用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1932年，斯大林和他的同伙决定取消所有非官方的艺术性质的协会和团体（包括无产文协、锻冶厂和拉普），新的艺术政策、文化组织取而代之，斯大林政府设立革命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官方指定的单一艺术倾向，强迫所有艺术家参加官方垄断的全国性艺术协会，由此绝对垄断了艺术的自由，代替了劳动群众自发的创造力。全苏联的艺术家们现在都必须加入官方的艺术协会，才能合法进行一切公开的文化生产活动，更不用提同时期一同收紧的言论审查。这种手段完全就是延伸了波格丹诺夫无产阶级文化理论中隐藏的代替主义手段，即以一小部分人（国家官僚机构）的官方美学体系来代替群众自己创造文化、艺术的自由。这种手段同样仅仅在名义上保持着“革命”、“社会主义”的名头，现实中却是在政治上逐渐走向完全脱离群众自己创作、欣赏文化、艺术的表达自由，完全是一种政治上的反动。

并且，由于斯大林政府是从一个工人国家的层次执行的这种政策，政治错误的广泛执行反而使得这个理论内核本身更清晰地表现出它企图以降低文化、艺术本身的这种庸俗化倾向和居高临下的政治态度，实际上是为无产阶级的文化教育踩刹车。他们所做的，不是像列宁政府一样的耐心解释、教育和资助来放宽高深艺术的理解下限和学习门槛、以便丰富劳动群众的品味，而不降低艺术本身的复杂性——这种高明的做法才是扩展整个文化事业的手法。斯大林政府口口声声以保卫工人国家、教育工人阶级之名，粗暴地拦截了所有非官方的，但是依然是前卫的、创新的和复杂的艺术风格和运动，他们为了降低文化和艺术的下限，艺术家只要求产出简单明了、歌颂国家、倾向性极强的文艺作品，这样压制了文艺发展的上限，而且实际上只是拆东墙补西墙。更有问题的是，斯大林政府对工人阶级的态度完全是居高临下的，他们实际上认为高深艺术是工人阶级永远无法理解的，而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反动的、静止的，因为它不言而喻地将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素质低下视为永久。托洛茨基的评论在此处再一次适用：在革命斗争中，【一些】知识份子并不掩盖反而竭尽全力地表明倾向性，他们经常在艺术中牺牲艺术本身。

斯大林和他的同伙（日丹诺夫、高尔基、布哈林、拉狄克）是如何一方面扼杀了无产文协和拉普，但另一方面又接受了它们的理论思想的呢？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着重讨论。他们指责拉普的范围“太窄”但随后在其他场合再次、多次重复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论点。在1934年的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日丹诺夫谈到“苏联文学是有倾向性的，因为在阶级斗争的时代，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文学不是阶级文学，没有倾向性，所谓非政治的。”[22]这其实完全是岗位派的主张，在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会议决议中，岗位派明确表明：“在激烈阶级战争的时代，阶级社会的文艺不可能是中立的，而且是积极地为一阶级服务的……因此，不同文学思想的流派可以和平竞争的说法是反动的思想”。[23]

高明的谎言往往是半真半假的。日丹诺夫这句话从最简单、最粗浅的层面来考察，貌似是正确无比的，但是实际上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缩减、还原主义。这种说法是我们当今许多左翼中支援“文化革命”的份子都会照抄复述的，但似乎并没有很多人能够跳出那段字母表级别的同义反复阶段，因此值得仔细讨论、分析所谓艺术的阶级性，以及阶级的艺术倾向问题。

的确，马克思主义者同意，阶级社会下的任何艺术都不可能与阶级无关，但文学、艺术的倾向性、纯粹性这一问题并不就此结束，反而，如果我们严肃地为艺术的未来考虑，我们应该再进一步提问：一个阶级是为何、又是如何在上层结构上选择其倾向、风格，这些倾向和风格又是怎么进一步演变的呢？物质基础如何与上层建筑互动的这一过程并非直截了当、一成不变的自动、平行的过程；在这里，一加一不总是等于二。以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为例，虽然议会民主制是资产阶级的典型体制，但是这并不能说资产阶级总是采用议会民主。相反地，我们在历史上经常看到资产阶级由于无法直接稳固地掌控政权，便走向某种形式的波拿巴主义独裁，以便勉强维持资本主义的统治。

相似的，正如政治体制，文化、艺术的各种形态虽然首先是受物质环境的决定性影响，但是在具象化的这个过程中，它们必不可免会受阶级斗争的动态的、具体的情形所影响，只有在经历一段运动中的思维进程才能找到自己的倾向、风格和具体形态。回

到文化、艺术，15、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蓬勃发展的新生欧洲资产阶级，曾深度采用了人文主义、古典主义的美学、艺术风格，而这种对古希腊和罗马时代世俗主义文化的探索并非是无目的的。这种探索的驱动力实际上源于同一时期商人阶级的经济、政治力量的崛起，以及其对封建主义的挑战。逐渐落后的贵族、教士与（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之间物质的、社会的阶级斗争，必然在意识层面引起革命阶级向进步思想的大力钻研和探索。

资产者对革命在美学上的探索最终在世俗、异教色彩浓重的欧洲古典时期文化中找到归宿，促成了资产阶级数个世纪的人文主义和古典主义的美学、艺术风格。艺术的领域，米开朗琪罗的雕塑，拉斐尔、达芬奇的画作，莎士比亚的戏剧，塞万提斯的小说等等作品处处都代表着那个变革时代中的资产阶级的品味、思绪和感受。而当进入了17、18、甚至是19世纪，在欧洲资产阶级的物质实力渐渐达到可以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之后，资产阶级在新的时代便开始寻找更进一步的革命思想，文化和艺术便开始出现更新的发展，逐渐放弃了人文主义和古典主义。但旧的文化并没有被完全抛出，而是被吸收进了新的部分：如果没有文艺复兴时期对欧洲古典文化中世俗主义的部分的再吸收，启蒙时代的欧洲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就不可能做到彻底地批判宗教的迷信、狂热，不可能将科学思想和理性思维进一步演变，继续形成其在启蒙时代的美学、艺术倾向和运动；而启蒙时代本身又是一个快速运动中的革命时代。资产阶级是经历过了这一系列过程才最终形成了自己在历史的这几个时期的艺术、美学倾向和风格，而这些倾向和风格也是首先在物质层面的变动中，然后是思想层面的社会运动中继续经历着变化，不断改变着自身。

诚然，文化和艺术是非常复杂的社会产物，笔墨原因，笔者此处的简短分析只能简略概括了资产阶级是如何选择自己的文化、艺术风格的这一个方面，但这已经足够展示了日丹诺夫、斯大林的僵硬的哲学方法，到底是多么无法理解文化在这种复杂而具体的历史发展中其形成的过程和扮演的作用。他们虽然时常用粉底打扮自己的教条学说，硬说自己是唯物主义，但是这种机械方法的粉底始终是劣质的，掩不住辩证法的缺失——只见形式逻辑的联系，而不见具体的形态是这种哲学的顽疾。

回到无产阶级文化的这个问题上，日丹诺夫在这里提出了与拉普之前的说法完全一致相同的肤浅而无用的说法，但更过分的是，他和斯大林主义国家将这些肤浅性带到了更广泛的程度——他们强化、并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强制执行了这一教条，所有艺术都必须是有倾向的、政治的……而关于“纯艺术”、倾向性艺术的问题，托洛茨基正确地解释道：

“关于”纯艺术”和倾向性艺术的争论发生在自由派与民粹派之间是合适的。我们不宜于参与这样的争论。唯物主义的辩证法高于这一点：对于它来说，从客观的历史进程角度来看，艺术永远是服务于社会的，历史地功利的……这完全不取决于艺术在这样的过程中是打着”纯艺术”的旗号还是公开的倾向性艺术的旗号。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这些有历史的局限性、同时又历史地被超越的流派相去甚远。在科学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同样信心十足地寻找着”纯艺术”和倾向性艺术的社会根源。它绝不”指控”诗人表达的思想或感情，它为自己提出了一些意义更为深刻的问题：一部有其本身的特点的艺术作品的形式符合什么样的感情序列？这些思想与感情的社会制约性是怎样的？它们在社会、阶级的历史发展中占据什么地位？还有，文学遗产中那些用来创造新形式的成分是什么？在哪些历史动力的作用下，思想和感情新的合成体才能穿透使它们与诗歌意识分开的那层外壳？研究可能会复杂化、细节化、个人化，但艺术在社会进程中的辅助作用，将是研究的主要中心。”[24]

换句话说，为了加强国家机器，斯大林、日丹诺夫和他们灾难性的社会现实主义方针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文学批评退化为俄罗斯民粹主义。他们并不理解文化除开其社会影响之外，在其形式层面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更不明白文化具体的社会功能是什么。他们对政治倾向性偏执般的坚持和强迫，最终导致了对无产阶级本身的压迫、对文化本身的庸俗化。

而另一个退化的例子则是高尔基，曾今的前进派成员、波格丹诺夫的同党，现在成为了斯大林在1934年的坚定支援者。他在代表大会上发言，甚至拒绝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文化延续，资产阶级”从来没有任何倾向创造文化”。[25]可笑的是，数个世纪的资产阶级艺术和文学传统和运动完全被他忽视了。而我们如果将他提的观点与拉普相对比，便能发现这个论点与拉普派拒绝文化延续的论点极为相似，虽然只是着重的点不一样，但是结论是一致的。高尔基说，资产阶级不创造文化，而延伸一下，拉普

派替他继续说完结论：那就把资产阶级踹开吧，我们不需要资产阶级的文化了！就像斯大林主义名义上谴责孟什维克主义，却实施孟什维克的阶级合作主义外交的两阶段理论一样，斯大林主义把无产阶级文化从前门踢出去，却从后门接回来。

因此，他们的唯心主义哲学，结合肤浅的机械分析，可以简单地得出极左的结论，即无产阶级必须在孤立的社会条件下发展文化，而不受革命前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说，文化的知识性创造和人文艺术不再是关于“排斥和断裂”性质的批判延续的任务，而是对革命前所有文化的绝对否定。这些唯心主义的想法在现实中永远行不通，因为这样的社会条件不是自然存在的，也无法维持，因为文化制造的漫长过程只会使这种伪无产阶级伪文化空洞化——成为一种没有社会现实的东西，而社会现实则是和革命前的社会和心理过程保持历史上的紧密联系的。

这种胡说八道不像任何唯物主义（尽管它的许多极左支援者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更不用说任何辩证法了。对于这些观点，列宁在1920年曾作出精辟的批判：

“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条条大道小路一向通往，而且还会通往无产阶级文化，正如马克思改造过的政治经济学向我们指明人类社会必然走到那一步，指明必然过渡到阶级斗争，过渡到开始无产阶级革命。” [26]

斯大林主义者从波格丹诺夫身上扩展出来的是艺术领域中灾难性的命令主义和替代主义倾向；不仅无产阶级必须有一种“自主的知识性文化”，现在这种“文化”必须在法律上替代其他倾向，并垄断艺术创作的所有权利。斯大林主义者在每句话的开头用幼儿读本版的唯物主义粉底粉饰自己，但在实践上便表现出他们的唯心主义：他们认为文化完全是主观的，完全受制于直接的政治干预——就好像一旦国家政府授予一种艺术倾向、运动和团体法律上的垄断权，那么整个国家的文化生活和艺术发展就会相应地沿着这个单一的倾向前进，而其他倾向就会消亡。现完全忽视了物质现实是怎么和社会各个发展部分联系的。

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艺术和文化作品也总是受制于其人口的各种社会条件和行为，如经济、社会生活、历史联系、心理意识和个体差异——而所有这些在意识层面上有一定的自主性，需要根据其自己的运动规律来具体考虑，仔细甄别其各部分，才能加以改造。他们所做的这种强加一种艺术倾向，而打压其他所有艺术倾向的行径，永远不会完全摧毁其他倾向的社会根源，反倒会为文化、艺术的发展营造一种不健康的无机环境，从而破坏文化本身的教育和表达功能，因为这会迫使艺术品最终成为非自愿和不诚实的“革命冒牌货”。这些虚伪的冒牌货最终只会变得空洞，因为它们将不再基于真实的想法、思想、感受和经验。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说：“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只能生产革命艺术的冒牌货，因为，真正艺术的首要品质是艺术家的诚实。”

文化、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

进一步澄清，尽管斯大林主义者和一些前无产阶级文化主义派对波格丹诺夫唯心主义的不断拒绝可能令人困惑，但波格丹诺夫与他们之间的基本政治、理论对应关系主要如下：

- 对文化功能的机械分析——无产阶级必须创造自己的“阶级文化”才能实现或维持无产阶级政权；
- 文化领域的替代主义方法——取代广大群众自发的耐心劳动，由少数人创造一种美学方法，并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这种术语加以粉饰；
- 教育层面的庸俗倾向——将劳动群众的文盲状态当作永久，无法处理俄国复杂的“综合不平衡发展”（最先进和最落后的社会发展共存的情况），为了教育群众便降低了文化层次，但实际上并不解决文化的长期发展。

在思想上，波格丹诺夫的“无产阶级文化”和斯大林社会主义都认为文化或多或少是纯粹主观的、精神的，需要庸俗化处理的，并且技术上可以通过国家机关的直接命令和替代主义来操纵的。这两种倾向同样是机械的、唯心主义的，看不到文化从无数有生命的物质现实中发展起来的辩证过程和因素，更是降低文化和艺术本身的复杂层次。

他们对当代艺术问题的回答和解决方案，并没有提供任何实际的分析，也没有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蓝图能够真正将劳动人民从文化异化中解放出来，帮助他们体会和利用他们时代的文化和知识来改善自己的文化生活。而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站在这些谬误之上，推动无产阶级在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基于对更广泛的目标、物质方面和经济社会根源的初步理解来看待文化和艺术，同时对文化和艺术作品中涉及的意识方面（思想、想法和感受）把握其全面的、动态的复杂性。

“无论在逻辑学、法学还是在艺术中，唯物主义都不否定形式因素的意义。就像法学体系能够而且应当按照其内在的逻辑性和一致性去评判一样，艺术也能够而且应当从其形式成就的角度去评判，因为，没有形式的成就，就没有艺术。但是，一种企图确定法律独立于社会环境的法学理论，在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动力存在于经济和阶级矛盾中……文学用各种植根于遥远的过去和作为语言技巧的经验积累的方法和手法，表现着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阶级的思想、感情、情绪、观点和希望。从这里跳不出去的。似乎也没有必要跳出去，——至少【革命者而言】没有必要这样做。”[27]

因此，工人国家在文化、艺术上的任务不是武断的选择一种风格，来垄断文化、艺术的演化路线，而是耐心地以长远的革命观来监督、修剪文化的这盆生长在社会经济基础上的美丽植物。不错，我们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认为任何文艺都是要服务阶级的，但是我们并不是粗暴地、短视地取消所有非无产阶级的文化、艺术倾向和知识份子，而要考虑到的是如何充分地利用这些倾向中的遗产来教育、培养、提高劳苦大众的文化素养，从而来保证工人国家的维持和健康发展，更使得艺术本身也能在更健康的环境下茁壮发展。在文化、艺术领域，工人国家的任务不是雷厉风行作风的发号施令——事实上，如上文解释，这样的做法才是完全胡闹的——而是在革命监督下，耐心地教导无产阶级如何辨认反动思想、如何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并以革命的果实吸引革命的文艺“同路人”，好让文化、艺术根据自己的规律，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有机地产出有益的、甚至是进步的成果。

现在，随着围绕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历史、理论和政治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可以继续丰富我们对这些思想的理解。那么，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既然波格丹诺夫、无产阶级文化派

和斯大林主义者只留下了错误答案，那么文化在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社会中究竟会是什么样子？

当然，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算命道士，但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中，文化建设的总体前提、宏观过程和最终结果。首先，通过总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将上升自己命运的主人，并努力摆脱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和压迫。因此，他们将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行调节经济生产的节奏，使得他们有能力、有时间、有精力打开（就像列宁所描述的那样）“人类在[其他统治阶级]下积累的知识宝库”。随着这些社会条件按照他们的意愿得到改善，无产阶级将逐渐达到不再是雇佣劳动者的程度，并超越其基础的生存需要，开始享受和掌握自己的充分自由的地步。那么，旧的文化异化将很快相应地消失。

正因为如此，超越阶级社会的新人类艺术和文化将充满在阶级社会下充斥着难以想像的可能性。俄国革命开端时那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爆炸就是一个充分例子，许多作品和艺术风格到今天依然毫不过时，甚至可以说是先进的、前卫的。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托洛茨基持着慎重而乐观的态度，对共产主义下人类的未来作了一个美好的畅想：

“人将无可比拟地更有力，更聪慧，更机敏；他的身体将更协调，其动作将更有节奏，其声音也将更有音乐感。生活方式将具有富于变动的戏剧性。中等类型的人也将达到亚里士多德、歌德、马克思的水准。在这一山脉上将耸起众多新的高峰。”[28]

参考文献

- [1] 社会主义艺术创作的任务，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1907，<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unacharsky/mia-chinese-lunacharsky-1907.htm>。
- [2] James D. White, “Alexander Bogdanov’s Conception of Proletarian Culture”, *Revolutionary Russia*, no. 1 (June 2013), 62.
- [3] Ibid.
- [4] 巴格丹诺夫致卢那察尔斯基的信，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1917年12月2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ia-chinese-russia-19171202.htm>。
- [5] Lynn Mally, 【未来的文化：革命俄国中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Culture of the Future: The Proletkult Movement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xix.

[6] John Biggart, 【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以及无产文协国际的短暂历史】" Alexander Bogdanov and the short history of the Kultintern", 【国际波格丹诺夫学院公报】 Bulletin of the International Bogdanov Institute, no.3 (2001): 76-87, <https://bogdanovlibrary.files.wordpress.com/2018/11/bogdanov-and-the-kultintern.pdf>.

[7] 我的强调: 托洛茨基, 诗歌的形式主义学派与马克思主义, 无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 《文学与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8] 列宁, 宁可要少些, 但要好一些, 中马库, 1923年3月4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ia-chinese-lenin-19230304.htm>

[9] 列宁,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 中马库, 1920年10月.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20a.htm>

[10] 我的强调; 托洛茨基, 无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 《文学与革命》。

[11] Christopher Read, 【克鲁普斯卡娅,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以及苏联文化政策的起源】" Krupskaya, Proletkul' t, and the Origins of Soviet Cultural Policy," 【《文化政策国际杂志》】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no. 3 (Dec 2006): 245-255.

[12] 我的强调; Murray Frame, 【早期苏维埃文化: 教育、科学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Early Soviet Culture: Education, Science, and Proletkul' t", in 【《与俄国革命同行》】 A Companion to the Russian Revolution, ed. Daniel Orlovsky (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 2020), 375-382.

[13] 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定草案, 1920年11月10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05.htm>

[14] 列宁,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

[15] 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定草案, 1920年11月10日。

[16]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俄共中央委员会来信)】 On the Proletkul't (Letter from the Central Committee, R.C.P.), Dec 1, 1920, in James Vaughan, 【附录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起源和理论》】 Appendix III to Soviet Socialist Realism Origins and Theory, (UK: Macmillan Press Ltd., 1973), 112-115.

[17] 卢那察尔斯基, 革命和艺术, 中马库.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unacharsky/mia-chinese-lunacharsky-1920.htm>

[18] Mally, 【未来的文化: 革命俄国中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 Proletkul't, 249.

[19] 张秋华等, "拉普"资料汇编(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 217页至219页。

[20] 我的强调: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法令, "关于党在艺术文学领域的政策", 1925年7月1日,】 Decree of the Politburo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R. C. P. (B.), "On the Policy of the Party in the Sphere of Artistic Literature", 1 July, 1925, <https://www.sovlit.net/decreejuly1925>.

[21] 张秋华等, 拉普资料汇编(上), 205页。

[22] 【日丹诺夫】 Zhdanov, 【"苏联文学"——最丰富的思想, 最先进的文学】" Soviet Literature is the Richest in Ideas, the Most Advanced Literature", MIA, 1934, <https://www.marxists.org/subject/art/litcrit/sovietwritercongress/zhdanov.htm>.

[23] 张秋华等, 拉普资料汇编(上), 17页。

[24] 托洛茨基, 诗歌的形式主义学派与马克思主义, 《文学与革命》。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literaturerevolution/105.html>

[25] 【高尔基】 M. Gorky, 【苏联文学】" Soviet Literature", MIA, 1934,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gorky-maxim/1934/soviet-literature.htm..>

[26] 列宁, 青年团的任务, 1920年10月2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9/041.htm>

[27] 托洛茨基, 诗歌的形式主义学派与马克思主义, 《文学与革命》。

[28] 托洛茨基, 革命的艺术和社会主义的艺术, 《文学与革命》。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literature_revolution/108.html

【女性解放专题】LGBT：解放与革命

Alessio Marconi 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

近年来，反对性别压迫和基于性取向的歧视的斗争已经在许多国家发展成为群众性运动。我们看到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表达着几十年来积攒下的愤怒和反叛，抗击着那种令人恼火的体制性干预——这种体制不仅迫使你每天为生计奔波，而且还声称有权决定你在私人生活中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可以和谁发生性关系或其他关系、是否可以养育子女，等等，并使得任何背离所谓“传统家庭”规范的人陷入社会与法律的困境。（按：本文最初刊登于意大利理论杂志《锤子与镰刀》，英文版于2017年9月12日发表。译者：洪磊）

由于其解放要求以及群众基础，这些抗议活动具有内在的革命潜力。同时，也有人有意识地试图将这些问题简单归结为文化问题，将运动的目标限制为争取符合资本主义正常（即压迫性的）运作的微小让步。许多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的理论都在表面上显得很激进，但在实践中却把LGBT（译注：指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等）运动的斗争归入唯心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路线上；这样的路线终将走入盲目的死胡同，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物质条件的改变。

为了LGBT运动的胜利，至关重要的是要采取阶级方式，将反对恐同压迫、争取完整公民权利的斗争和争取体面生活、免受经济

与社会压迫的普遍斗争结合起来。同样重要的是，工人运动要承担起LGBT的斗争，克服历史上存在的分歧，特别是由左派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领导所造成的分歧。

作为革命者，这一目标是我们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即旨在为了这一问题上进行更进一步的理论辩论提供基础。

今天的歧视与恐同

如今，同性恋或其他相关行为在72个国家仍然被官方规定为是违法的，其惩罚措施包括从一个月到15年之久的监禁，以至于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在8个国家）。在沙特阿拉伯等国家，死刑的执行方式是用石头砸死，而另外一些国家则会采取鞭打等体罚形式。只有23个国家承认同性婚姻，另有27个国家承认民事结合。[1]

然而，即使是在具备法律保护的地方，官方的歧视也会通过多种形式体现出来。例如，美国的一些州有着“禁止提倡同性恋的法律”，限制着人们的特定行为，也约束着学校或其他公共机构所能够教授的性道德类型。这在意大利也十分普遍：右翼和天主教会意大利的学校里发起了针对所谓“性别理论”的圣战。这些人鼓励极右翼采取行动，组织团体对同性恋者（以及移民和左翼活动家）进行暴力攻击。在过去的三年里，一项反对煽动恐同仇恨和加重情节的法律草案一直在议会委员会中积攒灰尘，而这并非偶然。虽然这项法律还不够彻底，它至少能确保一定程度上的保障。显然，允许将乘船横渡地中海的幸存移民驱逐出境的那项《米尼提法案》在他们眼中的优先度要高得多！

除此之外，歧视还渗透在学校、工作场所、住房等日常生活中，并真实可感地存在于对于LGBT人群持续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压力中。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ISTAT）2011年的研究，由于害怕被围攻或解雇，只有四分之一的同性恋工作者公开宣布自己的性取向，而这个趋势在各省尤为明显。欧盟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8%的欧盟公民认为基于性取向的歧视确实存在。另一项民调显示，在意大利，只有6%的高中LGBT青少年在更广泛的社区内完全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还有39%则只在较小的朋友圈子里部分公开——其他欧盟国家地平均水平也与此类似。94%的LGBT青少

年宁愿部分或完全隐藏自己的性取向，这充分说明了社会歧视给个人带来的困难。这种压力直到家庭中也同样存在，事实上，家庭往往是人们发现自己不被接受的第一个地方，而这又会延伸为种种暴力，从被锁在家里直到遭受殴打和“矫正性”强奸。青少年“因为身为同性恋者而自杀”的新闻并不少见，这是社会和家庭层面产生的心理压力所带来的最终的悲惨结局。

说什么“传统家庭”？

每一场仇视同性恋者的运动都以同性恋从根本上“违背自然”的论点为基础。在宗教原教旨主义中可以看到这种思想最庸俗的表现，但这个论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存在于“科学”界——这证实了一个事实，即科学会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在心理学上，同性恋在很长时间内被科学界的大多数人认为是病态的，或者至少是一种非生理状态，甚至最进步的心理学家也是这样认为的。弗洛伊德便是如此：他虽然不鼓励歧视，但仍然认为同性恋是对性发育的干扰。就连基本支持性解放、（至少在他人生的早期）具备唯物主义和革命视野的威廉·赖希，也把同性恋定义为“情感和性功能发展很早失调的结果”。直到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APA）才不再将同性恋视为一种病态，并在1986年终于取消了“自我障碍型同性恋”（一种假想出的同性恋病态，被视为压力的来源之一，与基于生理的自我和谐型同性恋相对）这一类别，承认心理压力实际上是由同性恋者所遭受的社会压力造成的。四年后，在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终于将同性恋从其精神疾病名单中删除。

非异性恋的取向和行为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其在人类历史上以及全世界的广泛存在即能证明这一点，这一事实在人类学、历史和文学研究中都有着大量的记录。[2]在美洲原住民中有所谓“双灵者”的记录，即衣着行为类似男性的女性，或反之类似女性的男性，这些人常常会参与到宗教仪式之中。众所周知，公元前4世纪的底比斯有过一支神圣的营队，由150对男性士兵伴侣组成，他们在战争中所向无敌，因为每个士兵都希望保护自己的爱人，并在爱人面前表现出英勇的气概——每一名士兵都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每一场战斗中去。同样广为人知的是，在雅典和罗马，（男性）同性恋关系在社会上和法律上都得到了认可。

话虽如此，我们并不能像在一些肤浅的阐释中看到的那样，将这些视为性关系完全自由的例子，或者到现代压迫之前去寻找一个“同性恋的黄金时代”。

在雅典，在前城市时期以及城邦诞生后的最初几年，社会规范下的男同性恋关系包括一个自由成年男性公民（通常在25岁以上）和一个自由男性青少年（12岁至17岁）之间的性关系，其目的是教育青少年长大成人并获得公民身份。性关系是这种教育关系的一部分，由一种历史更悠久的成人仪式传承而来，而其中二人的角色是严格固定的：成年人是积极的追求者，而年轻人则是顺从且害羞的，只有在追求者表现得情真意切时才会屈服。这种关系会一直持续到年轻的一方成年，然后经过一段禁欲期，再承担起新的角色直至结婚。与奴隶之间发生关系是不被允许的——那样的关系没有任何教育目的，因为奴隶是注定不会成为公民的——而成年人之间（至少在理论上）也是不被允许的。这种关系在婚前极为普遍，且只在个别情况下才会持续到婚后。另一方面，女性则在家中与世隔绝，被禁止参与社会生活，而女同性恋关系也被认为是令人厌恶的，尽管这样的关系确实存在，尤其是在教育年轻女性的学校里（萨福是一位教育者），在她们最终被禁锢在家之前。几个世纪以来，男同性恋关系的传播和角色分工的削弱导致了一定的社会污名化。

相比之下，在罗马，性行为被视为男性支配地位的体现，因此，一个自由公民采取被动角色是不可接受的，即使是在年轻时也是如此。男性之间的同性性关系被认为完全合法，但前提是处于顺从、被动地位的一方必须是奴隶或男性妓者——《斯卡提尼亚法》（Lex Scatinia，约公元前3世纪或前2世纪）禁止对年轻的自由男性进行性骚扰，也禁止他们在与成年男性发生性关系时充当被动方，并以罚款惩罚这种行为。随着时间推移，在罗马帝国时期，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一种类似于希腊式“少年爱”（pederasty）的关系逐渐传播开来。随着相关禁制逐步放宽，自由男子、奴隶以及男性妓者之间的被动性行为逐渐增多，其中甚至包括尤利乌斯·恺撒和凯撒·奥古斯都这样的显赫人物。然而，到了公元4世纪以后，男性之间的同性关系开始受到法律越来越多的限制：公元342年，对充当被动方者施以阉割；公元390年，对充当被动方的男性妓者处以火刑；公元438年，将死刑适用

于所有充当被动方的男性；最终，到了公元533年，所有形式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都被处以死刑。

基督教作为主导宗教的出现，对压制同性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基督教会是第一个宣布同性恋关系“违背自然”的，这种观念至今仍在宗教道德中持续存在。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因为此前即使是反对同性恋关系的人也没有谴责其违背自然，而主要是希望加强家庭在社会中的角色和稳定性，往往论述家庭对于人口增长的必要性。最早提出对同性恋者进行神罚的是查士丁尼。这种对同性恋的压制与基督教的禁欲观念相辅相成：根据禁欲概念，只有以生育为目的的性交才是合法的，因此无节制的、通奸的性行为必须受到压制（通奸在此前是被社会所接受的——当然只是针对男性而言）。[3]

从这一简短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首先，同性恋和双性行为一直存在，这一点从社会实践中便可以看出，但更是体现在对非规范的同性恋关系施加限制（例如希腊和罗马对于成年男性之间，或者女性之间）这项事实上，即那些更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爱，而其在历史上已经多次出现。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关于性爱的社会规范，这一事实证明“传统家庭”的概念是没有根据的，更不用说今天人们所坚持的具有相互忠诚纽带的传统一夫一妻制家庭了。这种模式只是在基督教统治下才被采用，而即使如此也只是作为一种理想状态。通奸以及男性所能获得的卖淫服务，其社会存在形态则大不相同，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无数变迁，时至今日仍呈现出多种形式，而这些形式又取决于具体的社会经济环境。试想一下，昔日农民的大家庭与今天蓝领或白领劳动者的核心家庭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异。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我们需要指出，这些规范绝不是性自由和情感自由的表达。首先，奴隶和女性被完全排除在外，而且只有特定形式的行为被认为是合法的，其他形式则被禁止。此外，至少在希腊的情况下，男性之间的性关系是一种社会制度，并不会考虑到公民或年轻男孩的性取向，而他们或许会在性关系中感到不适。

因此，总而言之，这些法律实际上是对情感、家庭和性生活的不同形式的管制，包括当合法行为受到侵犯时应采取的压制措施，且由社会结构决定什么是合法的。

同时鉴于这些考虑，我们可以断言，一般说来对非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行为的压制是以不同程度的强度和限制形式出现在人类历史上的，其目的是稳定家庭关系、特别是保证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基础和巩固。

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解释的那样，家庭并不是一个始终存在的稳定机构，而几项最近的人类学研究也以其主要结论证实了这一点。在狩猎采集阶段，当经济、食物和工具的管理以及子女的养育都要在社群层面进行时，女性具有突出地位，社会也是母系社会。由于人类对动物的驯化、农业革命以及生产资料集中到男性手中，父权压迫才随同阶级社会一起开始，一夫一妻制婚姻也成为了新的家庭结构的基础，其主要目的是保证父系继承。由此便产生了对妻子和子女的占有意识，而这种意识在今天仍然非常普遍，影响着数十亿人的生活。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对女性的压迫、女性在社会中的边缘化，以及对女性性行为的压制，使得女性沦为单纯的生育工具（照顾家庭和子女），并随着各种家庭和社会结构的演变而成为结构性的、历史性的。对于一夫一妻制家庭之内、繁殖以外的性行为的态度，则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是对家庭这一机构的威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女性之间的同性恋爱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制（我们在上文只提到了一部分）。但是，我们可以说，只要一夫一妻制家庭被认为是社会的根本基石，是合法情感和性行为的唯一模式，我们就不可能克服基于性取向的社会歧视。

阶级斗争与同性恋解放

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是与反对整个阶级社会的斗争紧密相连的，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正如我们已经解释过的那样，只有废除阶级社会，才能创造出足够的物质经济基础和文化驱动力，以摧毁作为社会唯一基本单位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模式。通过在社会上完成如今被分配给家庭领域的所有任务，且主要是分配给女性

的任务（做饭、打扫卫生、养育子女），以及通过获得社会所能提供的最好的物质和文化资源以允许个人自由发展，便有可能推动人际关系和家庭纽带逐渐摆脱物质需求，而只与浪漫的、性的欲望相符合，由此化解目前存在的压迫性规范与歧视。

第二个原因是，LGBT群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工人、青年、临时工、无业者，因其在工作场所和生活（或生存）条件中的阶级，以及其身份或性取向，经受着双重的压迫。因此，将反对这两种压迫的斗争结合起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二者的敌人是一致的。此外，我们不应忘记，恐同偏见也是为了分裂工人而被培养出来的一——例如，以此使得异性恋工人在自身可能受到压迫的同时，相信自己依然比同性恋者更加优越（多么令人满足！），与种族主义偏见的滋生如出一辙。右翼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言而喻的。

谁说必须把斗争的两条战线分开，谁就落入了敌人的圈套。并且通常，在LGBT运动中，鼓吹这种立场的往往是那些有钱人，并没有经历过LGBT工人和青年所面临的物质问题。事实上，它们将运动限制在呼吁政府做出微小让步的层面上，并不掀起太大的风浪，往往也并不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例如，20世纪50年代（在意大利和全世界）的同性恋友好运动就是如此，其后来受到了60和70年代同性恋解放运动的猛烈批评，而这些运动就则是在当时阶级斗争浪潮的基础上沿着革命路线发展起来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指出，20世纪下半叶LGBT运动与工人运动之间的分裂，其责任很大程度上在于共产党的领导层。他们在斯大林主义堕落的基础上，采取了公开仇视同性恋的立场。这些立场只是在后期才有所软化，而后则大多采取了争取公民权利的改良主义观点，是其政治纲领中改良主义的反映。

然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没有提到同性恋问题，但是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曾多次发表声明，表示反对德国法律中对同性恋者的任何歧视或对同性恋的惩罚。绝非偶然地，当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在19世纪末成立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推动废除德国刑法典中将同性恋定为非法的第175条时，他的请愿书在1898年议会讨论中只得到了少数派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赫希菲尔德的工作在此后

依旧继续，他成立了性研究所，随后又在1921年组织了第一次性改革大会（有一名苏联代表参加）。赫希菲尔德的工作标志着近代以来第一次在科学辩论的基础上将同性恋去罪化的伟大努力。赫希菲尔德本人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态——或者至少是一种非生理状态——但没有任何理由对其进行惩罚。然而，第175条并没有被废除，而纳粹主义在战胜德国工人运动后则开启了一段对同性恋者进行无情打压的黑色反动时期。1933年5月6日，性研究所成为了第一批被纳粹青年突袭的建筑之一，他们在广场烧毁了从其图书馆里找到的所有文本。纳粹加重了第175条所规定的惩罚，导致10万名同性恋者被逮捕，6万人被判刑、被关进精神病院，以及被强制绝育。同性恋者与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共产党员们一起被送去了集中营。

十月革命后同性恋者的境况

在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工人在历史上第一次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除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短暂时期之外），其不仅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且也在家庭方面改变了数百万人的生活。苏维埃政府给予女性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将离婚和堕胎合法化，并且促进社会服务的广泛发展，为女性从家庭责任中解放出来提供经济基础：托儿所、公共食堂、洗衣房、日间医院、电影院、剧场等等。同时，随着沙皇刑法被废除，同性恋也被去罪化（而在沙皇时期，同性恋是要被重判监禁的）。

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是，性行为属于私人领域，因此不应受到制裁或管制，除非它伤害了他人（例如，如果涉及胁迫或暴力的话）。在俄国的科学辩论中，同性恋依旧被视为是一种疾病——就像在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但这种观点并没有引发任何歧视。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的具体实例之一，便是在赫希菲尔德的性改革大会上一名苏联代表的与会，以及身为公开同性恋的格奥尔基·契切林于1918年被任命为了外交委员。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

传统家庭开始被社会变革所打破：男性和女性都被要求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且青年人至少部分地从传统的家庭权威中被解放了出来，争取新的社会（包括情感和性）关系，[4]特别是在青年

群体之内。然而很快，革命所开启的激进变革，即使是在家庭和性关系方面，也遇到了革命所面临的由孤立和经济困难所带来的问题。物质资源过于有限，在其条件下别无其他可能：公共服务的质量通常很低，以至于必然会出现重归以往家庭结构的趋势。与此同时，通往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堕落开始发生了，而这就意味着与列宁、托洛茨基以及十月革命的理想诀别。

这种现象有两个后果。一方面，由于缺乏在更先进的社会层面上发展家庭和情感关系的物质基础，传统家庭卷土重来；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这个问题也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被克服。另一方面，斯大林政权从家庭和传统道德的回归中看到了政权稳定的源泉，特别是能够将其作为一种加强权威观念（从一家之主对子女的权威开始）的工具，而这种权威观念正是当时被积极提倡的。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写道：

“家庭的胜利复位，与卢布的复位同时发生（真是天缘巧合！），原因是国家在物质和文化方面的破产。领导人不是公开说：“我们实在还是太穷，也太无知，所以不能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社会主义的关系，我们的子孙会实现这目标”，而是强迫人民把破碎家庭的外壳重新黏合起来，不仅如此，还用严刑重罚来强迫人民承认这就是胜利的社会主义的神圣核心。很难用眼睛测量出这种倒退达到什么程度。”（《被背叛的革命》，第七章，《家庭、青年和文化》，“家庭中的热月”）

这个过程同样也改变了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政权不再依靠相对自发地战胜了反同偏见的城市无产阶级，而是依靠小资产阶级分子和不发达的远东地区。（例如，在1925年的突厥斯坦，苏维埃刑法中又增加了一项条款，规定了对同性恋的惩罚）。而在1933-34年，禁止男同性恋关系的规定又得以恢复，使其可以被判处监禁。在1935年，离婚被严格限制；对自由伴侣关系的承认被废除，而堕胎在1936年也再次被定为非法。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如果“家庭教条”已经成为了“胜利的社会主义的基石”，那么被视为家庭威胁的同性恋便成为了资产阶级腐朽的恶习。这种仇视同性恋的立场后来在国际上深深地感染了共产主义（斯大林主义）政党，危害了本应自然发展的同性恋运动，一项与革命运动本身紧密相连的运动。

从“石墙”到运动的停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阶级斗争普遍低迷的时期，一些同性恋团体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们如上所述，试图与政府建立对话，并对其采取柔和的态度，以赢得一些最低限度的权利，但收效甚微。在经历了一段社会斗争的低潮期和同性恋运动的衰弱期后，随着石墙暴动，同性恋运动作为一场群众运动在1969年的纽约再一次爆发（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是第一次）。6月28日至29日夜间，警察对同性恋酒吧（石墙酒馆）的第无数次突袭——直到那时还被认为是例行公事——第一次遭到了群众的抵抗，并发展成了一场为期两天的战斗，有一千人参与其中。

石墙起义改变了同性恋运动的面貌和性质，其不再是委员会或科学家的小圈子，并且打破了同性恋是一种不正常现象的观念，反而对其表示自豪。运动也由此转向左翼，走向革命立场，这与60年代末和70年代阶级斗争的兴起有关，虽然其中的联系较为模糊。在石墙事件之后，1969年7月初，同性恋解放阵线在美国成立。它采取了反资本主义和“第三世界主义”的立场，并且站了出来支持黑豹党的斗争。其他国家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1970年英国的同性恋解放阵线，其将会聚集数百名积极分子，但随后将在政治上分崩离析；法国的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FHAR）；比利时的同性恋革命行动运动（MHAR）。

1971年，意大利同性恋革命同一阵线（FUORI，此缩写在意大利语中意为“出”）成立了。至于其他团体，其规模并不庞大：在都灵、米兰和罗马（这三个城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政治差异）的三个团体中，勉强只有一百名积极分子。起初，他们的报纸每月在报刊亭出售，印刷量为8千份。

1972年4月5日，在圣雷莫市，FUORI组织了第一次反对国际性学大会的公开示威，该大会的议程是讨论同性恋的成因和可能的治疗方法。为了表现其讨论的基调，其中一种被提议的疗法是施加具有轻微痛感的电击，使其与男性裸体照片而非女性裸体照片联系起来；另一种方法则是有选择性地切除大脑组织。

在大会之外，数十名活动人士高喊着“我们是正常的！我们是正常的！”等示威口号，并举着写有“精神科医生，把你的电机

插进你自己的脑子”的标语牌。在会议大厅内，FUORI成员安杰罗·佩扎纳(Angelo Pezzana)进行了发言，以“我是同性恋者，并乐于如此”的名言开场。这次示威标志着同性恋运动的转折点，也标志着与温和派支持同性恋组织的决裂。

向着革命观点的转变是很重要的：在其报纸的第一期里，编辑部向“革命的[异性恋]同志们”发表讲话，要求他们“率先了解同性恋者的现实”，因为“性压迫是任何压迫制度中第一个、最狡猾、最危险的征服方法”。“我们认为，”FUORI的斗士继续说道，“需要一场性革命，与每个国家已经在进行的政治革命并行不悖且相互交融。”[5]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没有明确马克思主义纲领的组织，但它却明白同性恋运动与革命观点相结合的内在潜力。然而依旧，这没能走到最后的主要原因，就是工人运动领导层的恐同立场。

在圣雷莫示威后几周，1972年5月1日，FUORI罗马分部与其他团体一起在鲜花广场组织了一次示威，以“庆祝欢乐、反对工作、争取性解放”。在某一时刻，一群来自议会外左派的积极分子来到了那里，“自称是‘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一个极左团体），同时高喊着‘死基佬滚出鲜花广场，’开始向示威者泼水”。[6]

至于从未正式处理过这个问题的意大利共产党（PCI），则在1974年第3-4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杂志上发表了卢恰诺·格鲁皮(Luciano Gruppi)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出了以下观点：“正是我们认为社会与自然之间必须建立的那种关系告诉我们，同性恋与之相反地打破了这种关系，因为它违背了一切生物的基本本能：物种的延续。因此，同性恋使人的个性变得贫乏，并深深地改变了人的个性。它往往从孤独中诞生，也往往以孤独而告终。”[7]不用说，在该党内活跃的同性恋工人和学生一定感到非常不适。是1975年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被谋杀一事开启了党内的辩论，使得该党在70年代末，即刚好在从1968年以来席卷意大利的激进斗争浪潮开始衰退之前，改变了其对于同性恋的立场，而这一切都被框定在该党越来越偏向于改良主义的政策之中。

因此，这些活动分子并没有给新的同性恋运动活动家提供一种普遍政治斗争的视角，而这种视角本可以克服普遍的政治折衷主义。他们只是被工运推开了，从而最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从组织的观点上看，FUORI在1974年与当年偏左的激进党融合，因而放弃了革命的观点，只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为民权而斗争。FUORI中的一些领袖人物，包括马里奥·米利(Mario Mieli)，因此与运动决裂，转向了议会外的左派，但不幸的是，那时它也即将走入不可逆转的危机。

LGBT运动与劳工运动之间建立联系的机会的丧失，在2014年的电影《骄傲！》中得到了很好的强调。该片讲述了大不列颠共产党（CPGB）青年部的同性恋活动家马克·阿什顿（Mark Ashton）的真实故事，他在1984年的伦敦骄傲游行中，基于阶级团结以及对撒切尔反动政府和更广泛资本主义体制的共同反对，发起了支持矿工罢工反对撒切尔的募捐活动。他设法建立了一个名为“男女同性恋者支持矿工”的团体，并克服了伦敦同性恋文化与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之间的互不信任，在二者间建立了联系，最终广泛地动员了英国男女同性恋者与矿工团结起来，也促成了大批矿工代表参加1985年的骄傲游行，并将同性恋权利纳入工会的纲领。70年代初，在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的领导下，旧金山同性恋社群也展现出了类似的团结，与国际工人兄弟会一起抵制康胜啤酒。

1984年的英国矿工大罢工至今仍是一场堪称典范的斗争，它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最后一次工人斗争大爆发期间，但很快就进入了运动的严重低潮期，而工运和同性恋权益运动都在其中被抛弃了。

在这种停滞不前的情况下，我们目睹了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分化，它退回到了争取福利的运动层面，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艾滋病问题、反对恐同暴力的团结问题、争取法律禁止歧视的问题，以及后来争取承认公民权利的问题上。这样，同性恋运动一方面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同性恋群体的改良主义、安抚性策略，另一方面又建立在70年代斗争的成果之上，即同性恋的自然性、骄傲和尊严已经被其一劳永逸地宣布了。这一切也迫使科学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改变其态度，承认同性恋行为的合法

性，从而打破了同性恋权利斗争的孤立状态。在此基础上，意大利LGBT协会发展了起来，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几个分支机构发展到了现在的全国性网络。

是新的理论，还是死路一条？

虽然20世纪80和90年代运动的衰落导致了从公开斗争中的止步与退缩，但学术界却展开了辩论，特别是在性别身份的问题上，而这便引出了所谓的酷儿研究或酷儿理论。这个词可以追溯到1990年。在此前一年，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出版了《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该书成为了进一步阐述的参照点。

尽管这种阐述从来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理论，但其核心观点是批判性别身份概念，以及男/女生理性别天生存在的观点，称这些其实都是异性恋社会的产物，即一个将基于异性恋“话语”的二元划分确立为规范（且通过权力关系）的社会。这是思维链条中的最后一环，该链条从女权主义分离主义（反对父权社会，把女性和男性对立起来）开始，经过女同性恋分离主义（女性不再被肯定，因为她被定义为女性是相对于男性而言的：只有政治意义上的女同性恋才能反抗意识形态上的男性统治），最后以酷儿理论结束（任何形式的性别身份都是异性恋父权意识形态统治的结果，因此它们必须全部被拒绝）。

现在，对于那些不被允许自由表达自己的性别身份或性取向的人来说，这些理论似乎是对社会强加属性的激进拒绝，因此很有吸引力。问题是，只要稍稍深入了解一点，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理论对于任何试图真正改变事物的人来说都是一条死胡同。

巴特勒认为，性别身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被“表演性地”创造出来的，即是在社会既定规范和“话语”所决定的重复行为的基础上产生的。[8]正是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的身份，反过来又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种观念：自然界中存在着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这一理论借用了福柯的观点：“对于福柯来说，当身体尚未在话语内被确定时，其并没有任何重要意义上的‘性别化’；在话语中，身体被赋予了自然或本质性别的‘概念’。身体只有在权力关系的语境下才会在话语中获得意义。性在历史上是一种

权力、话语、身体和情感的特定组织形式。因此，性被福柯理解为产生了‘性别’这一人为概念，其有效地扩展并掩盖了生成它的权力关系。”[9]

因此，男性、女性以及异性恋、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都将是由这种机制产生的虚幻类别，因为既然生物性别并不存在，那么性取向也就不存在。

这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了如何能够使一个部分的真理与现实脱节，并使之成为毫无结果的争论的全部和终结。没有人质疑一个人的意识会受到其发展所在的社会环境的强烈影响。然而，从这个正确的前提出发，否认男女两性及其之间解剖学和生物学上差异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10]如果我们从学术假说转向医学疗法领域，或者转向妊娠和哺乳，那么其存在就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此外，即使我说我的意识（由此便得出我对自己性别身份的认知方式）是由我所处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这是否就会让它变得没有那么真实了呢？不，它反映了我真实的存在条件，包括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并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但是，最重要的是：基于这种理论，我怎么才能争取性解放呢？简单来说：我不能。再次引用巴特勒的话：“因此，权力既不能被收回也不能被拒绝，而只能被重新部署。事实上，在我看来，男女同性恋实践的规范性焦点应该是对权力的颠覆性、戏仿性的重新部署，而不是全面超越权力这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11]也就是说，我们所能实现的最佳结果就是一种创造性的戏仿，一种对性别身份的漫画性描绘，以表明性别身份事实上并非一种自然的实体，而是一种产物。通过这种做法，我们表明性别并不存在，而由此便有可能“在男权主义统治和强制性异性恋的框架限制之外，扩展出更多元的性别配置”。[12] 这种后现代主义只是雷声大雨点小：我能够看到性别压迫，但我已经放弃了对社会的阶级分析，所以我不再能看到产生这种压迫的原因了；然后我将压迫（或者更进一步：压迫的单一或特定方面，即异性恋化的权力）上升为一种形而上的实体，一切都取决于此，而我对于如何推翻它没有丝毫想法；我所剩的唯一颠覆形式就是陷入一种主观主义，在其中我否认现实，认为每个人都能发明出属于自己的现实，而完全不改变我自己意识以外的任何东西。

意料之中地，统治阶级并不惧怕这些理论。同时，很明显，这些理论在学术辩论的圈子以外几乎或根本没有任何用处。所有那些迫切需要在现实世界中争取自己权利的人，还是最好能用更犀利的理论和斗争形式来武装自己。

在这里，值得简单地看一下最近在运动的某些层面上非常流行的交叉性概念。它或多或少意味着社会上存在着几种形式的压迫（基于性别、种族、阶级、性取向等等），且这些压迫相互交织、横向重叠，于是便有一种可能将不同运动联合起来的横向性质。

巴特勒本人也强调，之所以需要弱化“女性”这一普遍范畴，正是因为“来自女性的批评——她们宣称‘女性’这一范畴具有规范性和排他性，而且是由未标记的完整阶级和种族特权所产生的。”[13]没错！的确，工人女性和资产阶级女性受到性别压迫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而追求妇女解放的斗争一旦对统治阶级的特权提出质疑，就会导致沿着阶级路线的分裂；资产阶级女性会从中脱离，因为她们要捍卫自己的物质阶级特权，即使在家里仍然要从属于她们的（资产阶级）丈夫。

当我们进入经济斗争领域（争取住房、就业、医疗等）时，我们在LGBT运动中也会看到同样的情况，而公民权利正是在经济斗争中得以具体化的。这简明地告诉我们，社会的基本矛盾，即阶级矛盾，是我们在何种框架内进行斗争的决定性因素，而只有推进阶级斗争，直至推翻资本主义，我们才能为反对社会中存在的众多压迫的运动提供一个胜利的前景。

如果我们抛弃了阶级斗争是一切的核心这一观点，那么还剩下什么呢？我们持续不断地——且不完全地——努力在不同运动（LGBT、反种族主义、环保等等）之间建立联盟，而联盟的组成和平衡态各不相同，取决于其中哪一个在任一特定时刻是最强大的。在后现代视野中，这种方式甚至重新定义了其参与者的身份：“那么，一个开放的联盟将会肯定其中依照当下目的而交替着确立或放弃的身份；它将是一个开放的集合，允许多元的汇聚和分流，而不必服从一个对于定义性结局的规范化的终极目的。”所以，就连我的身份都可能根据某一次会议的组成或决议而在不同场合下发生改变！难怪人们对这一切感到困惑……

不足为奇地，这些理论在阶级斗争的停滞时期取得了进展；当时，主要的参照点——工人阶级——是缺失的，不能为推翻资产阶级及其所创造或延续的一切形式的压迫提供一个真正的可能性。阶级斗争的兴起，一如既往地，将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样发挥澄清的作用。

资本主义危机中的民权

自从2000年以来，我们看到许多国家通过了反对歧视、争取民权的法律，从同性婚姻到民事结合。这些重要成就的取得，得益于同性恋运动不断施加压力，以及包括异性恋者在内的社会对平等权利的日益支持。今天，不仅是左翼，而且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及其政治代表也都扛起了公民权利的大旗：我们有欧盟倡导的国际不再恐同日，我们看到了联合国就此问题通过的决议等等。

然而，我们不能保有任何幻想，也不能对这些事情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这些“自由”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开明”阶层，正是支持世界各地独裁统治的人，而男女同性恋者在那里会被施以绞刑或斩首。由此，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在特朗普和奥巴马的领导下——是怎样向沙特阿拉伯供应武器的。欧洲所有的主要大国也是如此，一边将同性婚姻合法化，一边支持埃及的塞西政权，而塞西政权除了对政敌进行各种逮捕、谋杀和酷刑之外，还对同性恋者进行严厉的镇压。这种虚伪可以被用于反动目的，而对LGBT权利的捍卫也可以成为支持帝国主义政策的借口。事实上，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在LGBT权利方面立法最先进的国家，这显然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是否授权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进行屠杀、轰炸以及禁运，因其政府对于公民权利的立法并没有那么关心？在荷兰，政府利用维护LGBT权利来限制所谓的“恐同”移民，甚至连世界各地的荷兰大使馆都有入境考试。如果我们看不到全局，尤其是如果我们放弃了阶级视角，我们可能很快就会落入反动阵营，就像一些LGBT权利团体那样，更关心赢得权力地位，更愿意对與他們結盟政府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14]

从资产阶级的角度来看，在民权上做出让步既有经济上的目的，也有政治上的目的。在经济上，LGBT人群只是市场的一部分，所以对同性恋友好的公司形象可以吸引顾客。宜家公司不会

不愿意在其目录上放上男性情侣的照片，只要他们有钱买厨房。同样地，它也愿意在广告中加入离异父母，只要他们有钱给孩子的两间卧室买入相同的家具，以使得两个家完全一致。而在另一方面，无业的同性恋者则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就广告界而言，他们并不存在，就像无业的异性恋者也不存在一样。

然而，在政治方面，一部分统治阶级正在试图化解可能出现的社会冲突领域，把能吸收到体制内的东西吸收进去，并寻求LGBT运动中温和派领袖的支持，同时推行排外、反工、严酷的紧缩政策，削减关键服务。

于是我们看到，鉴于家庭的危机和来自底层的压力，统治阶级的一派接受了法律上对同性婚姻的承认，而同时又在把同性恋者推回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庭的基础角色上，支持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因此，我们虽然有了同性恋婚姻上的进步，但这种婚姻却必须适应一夫一妻制家庭的模式。在某些情况下，这会导致男/女性别角色在同性恋伴侣之间的复制，包括家务劳动的分工和所有传统的资产阶级价值观。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低估了民权问题的重要性？绝对不是！我们努力争取使民权得到充分承认和全面适用，即家庭和个人权利的完全平等，无论性别和性取向如何。这包括结婚和领养的权利（这也必须适用于单身人士），收养继子女的权利（即收养自己伴侣子女的权利），对于同性恋伴侣也应适用。

但是，我们不能不顾全局，也绝不能忘记我们在阶级斗争中是站在哪一边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所捍卫的权利中，并不包括我们反对的代孕合法化——因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代孕必然会形成一个市场，其中那些女性出于经济需要，出卖自己的身体，并经历具有高度创伤性的过程，例如怀孕、新生儿被带走，以及由此带来的所有生理和心理后果。我们并不怀疑，这种做法在一些情况下是自愿的，是一种“礼物”，但绝大多数情况下的社会现实都与此大相径庭，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我们还应该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对拥有亲生后代的渴望，或者那种孩子的情感依恋必然与亲生父母相连的观念，是因为财产需

要在一夫一妻制家庭中得到传承而被灌输进我们的头脑中的。在私有财产兴起之前，这种观念是不存在的。

“你们这些白人，”一个美国土著人对一个传教士说，“只爱你们自己的孩子。我们爱的是氏族里所有的孩子。他们属于所有人，而我们都关心他们。他们是我们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我们都是他们的父亲和母亲。白人是野蛮人；他们不爱他们的孩子。一旦孩子成了孤儿，就只能请人有偿地照顾他们。我们根本不会有如此野蛮的想法。”[15]

革命与解放

我们为了所有公民权利都能得到承认而斗争，也在它们得到承认时热情地欢迎它们，即使是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阶级斗争的尖锐化随时可能促使统治阶级选择更为反动的道路，从而收回他们以前所给予的东西。让我们记住：克林顿们会带来特朗普们，马克龙们会带来勒庞们，除非他们被阶级斗争所阻止。只要我们还在资本主义制度内，任何胜利都不能保证持久。

而在这些权利已经被给予的地方，其目的真的是让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平等地被剥削吗？如果我没有房子或工作的保障，如果医疗系统处于崩溃状态而我却没钱购买我自己或所爱之人的医疗服务，如果我没有居住许可，我的公民权利又能让我怎样呢？如果我不得不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一个老板，而最后只能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那么同性恋婚姻权又有什么用呢？

一旦我们进入日常生活中的问题，LGBT运动内部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因为日常生活会因为所属阶级的不同而具有很大的差异。在2016年意大利支持民间工会的动员中，我们便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那场运动的群众基础主要由年轻人、临时工和学生组成，而比起那些认为动员只是为了争取对新法的支持、给PD（民主党）议会团体的右翼施加一些压力的领导层（其中就包括意大利LGBT协会）来说，他们要激进得多。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民主党废除了继子女收养，限制了改革的范围。运动的领导层接受了这一妥协，但基层民众则要求重新发起抗议。

当我们介入运动，呼吁将反对民主党政府的斗争普遍化，使其涵盖对于工作、住房和福利的争取时，领导层和抗议群众之间的这种分裂便在我们面前清晰可见。大多数抗议者热情地接过了我们的口号，而领导层——有时正是组织会议以表明自己多么关心民权的民主党——则尴尬地环顾四周，呼吁人们不要夸大其词。我们不能把带领我们争取权利的任务交给这些人。

我们看到了拥挤的广场，在那里要求人人享有完整民权的人不仅仅是LGBT群体，还有许多异性恋者，而我们也看到了争取民权的斗争是如何立即与争取住房、工作和医疗的斗争联系起来的。能够带来胜利的，正是这样的团结。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要LGBT运动沿着阶级路线发展，充分融入工人运动当中，并且劳工运动要采取革命性的纲领。

我们需要推翻资本主义，摆脱统治阶级的束缚，接管生产资料和财富并有计划地、和谐地使用这些资源，为了社会的集体需要而非少数人的利益。家务劳动需要被社会化；对儿童的看护和教育必须是高质量的。每个人都应有权拥有住房；工作时间应该被减少，以使每个人都有时间和经历来过自己的生活。

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我们将能够打破资产阶级在家庭结构和性取向方面长期存在的道德观念。我们将能够把父权制和恐同症扔进历史的垃圾桶，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每个人也都将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性欲和情感。决定要如何做到这一点，以及社会将要有什么样的形式和家庭关系，就是属于后代的任务了。

注释

[1]来源：国际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间性者协会（ILGA），2017年由国家赞助的恐同症报告。

[2]我们对同性恋行为在动物界的广泛存在的引用仅作为补充论据：这突出了同性恋行为在自然界的存在，但由于人类与动物之间在社会性和情感性行为上的差异，并不是最终定论。作为奥斯陆自然历史博物馆《违背自然？》展览的一部分的最近研究之一表示：“同性恋行为[...]被发现存在于1500多个动物物种中，其中500种动物的同性恋行为有着大量的记录，而实际程度可能要比这高得多。”

[3]参见：伊娃·坎塔雷拉，《古代世界中的双性恋》，耶鲁大学出版社，2002年，以及大量其他相关文献。

[4]关于这个尝试及其失败，参见威廉·赖希1936年《性革命》一书中的《在苏联争取“新生”的斗争》。另见列夫·托洛茨基《日常生活的问题》，以及《被背叛的革命》中的《家庭、青年和文化》一章。

[5] 引用自詹尼·罗西·巴里利，Il movimento gay in Italia（《意大利的同性恋运动》，暂无英文译文），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1999年，第51-52页。

[6] 同上，第59页。

[7] 引用自法比奥·乔瓦尼尼，Comunisti e diversi: il PCI e la questione omosessuale（《共产主义者与多元群体：国际公共关系委员会与同性恋问题》，暂无英文译文），代达勒斯编辑出版社，1980年，第72页。

[8] “换句话说，行为和姿态，以及被表达出并加以施行的欲望，会创造出一种内部的、组织性的性别内核的假象，这种假象凭借着话语而得以维持，其目的是在强制的繁殖性异性恋框架内对性行为进行管控。”（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罗德里奇出版社，1990年）。

[9] 同上。

[10] 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论述性别身份的起源。出于唯物主义的立场，我们在这里仅仅是要指出，性别身份必然是从自然（物理和生理）、心理和社会元素的综合作用下发展而来的。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参见以下报告中的案例：undefined。

[15] 蒙·弗·阿什利·蒙太古，《婚姻：过去与现在，一场罗伯特·布里福特与布罗尼斯瓦夫·马林诺夫斯基之间的辩论》，波士顿，波特·萨金特出版社，1956年，第48页。

【共产主义问答】托洛茨基为何不政变推翻斯大林？

布尔什维克编辑部

首先，斯大林背后是日益壮大的官僚集团。它掌握职位、资源和组织网络，要维护自身的地位和特权。在十月革命后的内战和饥荒中，早期广泛的苏维埃民主逐渐消亡，但俄共的党内民主仍发挥着对官僚专权的制约作用。1923-24年的托洛茨基在认识到党政机关正愈发被斯大林的书记处控制、选举流于形式、健康的批评遭到打压时所反对的，也就不只是斯大林个人或三驾马车，而是官僚主义本身。

托洛茨基在被解去军权前有能力武装推翻斯大林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尽管托洛茨基在红军中享有巨大的支持和权威，但这是基于托洛茨基对革命所作出的不朽贡献，而不是无条件的个人服从。但是哪怕可行，通过军事政变替换掉官僚的头目不仅不能遏制，相反只会加强官僚主义。如果托洛茨基企图绕过争取工人、农民和士兵党员，依赖军官集团夺权，结果只是军官官僚替代文官官僚，工人仍然无法掌控权力。

在左翼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时期，托洛茨基所重视的始终是通过辩论、说服争取党内的基层党员和健康干部来改善党的组织、政策和作风。利用官僚组织手段而非群众力量反

对斯大林集团结果只会是“进一步、退两步”，让苏联离健康的工人国家越来越远。

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托洛茨基也犯下过战术性的错误，例如在1923年党的十二大上没有公开向官僚主义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斗争，并对呼吁罢免斯大林的列宁遗嘱保持沉默。由于等待列宁康复和担心被误解为争夺个人权力，托洛茨基迟疑了。没有这些错误，或许托洛茨基能够暂时地击败斯大林和三驾马车。但说到底，官僚主义的崛起有其具体的历史原因。欧洲各国革命的失败加深了俄国革命的孤立。内战、饥荒和疫病消耗了俄国的工人先锋。并且，当时落后且饱经战争摧残的苏联经济也无法提供工人阶级普遍参与管理国家的物质基础，孱弱的重工业进一步限制了工人阶级的基数与政治杠杆。不解决这些问题，官僚滋生的土壤就会一直存在。

在1930年代中期，意识到官僚已经从一个社会集团发展为特权阶层的托洛茨基在以上的纲领上增加了政治革命的诉求，主张推翻官僚层、恢复十月革命后的工人民主，并建设新的革命国际——第四国际。这是托洛茨基真正的主张。